

#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5年10月31日第19期

总第142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142期

### 【专稿】

胡庄子 “忠字化运动”初探

### 【序与跋】

文 研 《王大宾回忆录》的新视角、新观点（序一）

### 【要有光】

胡 杰 在杨海棠家的墙上，毛主席像挂了很多年了（版画）

依 娃 甘谷逃荒人杨海棠访谈——你领上娃娃逃个命去

### 【大饥荒】

陆 凌 《一九六零年》之前言、第一章

### 【评论】

杜钧福 读刘朝驹的《文革史话》

袁洪权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时期的《萧军日记》

### 【述往】

王丕忠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之（二）监禁和审讯

马昌海 追忆三线“五·七”厂（三）

### 【资料】

1. 1967年1月26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全体革命造反派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2. 1967年2月2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3. 1967年2月6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 【版权声明】

【专稿】

## “忠字化运动”初探

胡庄子

在文革初期，中国大地上流行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67年下半年至1969年，出现一个有理论、有内容、有仪式的“忠字化运动”，将个人崇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忠字化运动”不是官方发起的，是由各地区兴起，最终汇成一个“运动”，出现许多中外历史上很少见到的奇观，许多形式令人叹为观止。

有意思的是，在“运动”中并没有“忠字化运动”这个名字，名字是官方在制止这个“运动”时命名的。所以，文革后，大家七嘴八舌说“个人崇拜”，却少有人注意“忠字化运动”。这里，笔者对“忠字化运动”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回顾。

### 一、从“三忠于，四无限”谈起

“三忠于，四无限”是文革中流行的一句浓缩语。“三忠于”指：“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三忠于”的形成有一个过程：

《解放军报》1967年元旦社论中提出：“要无限地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这是“三忠于”的雏形。《解放军报》1967年5月31日社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中，首次出现“三忠于”的表述。

1967年11月30日，李作鹏在海军的一次大会提出：“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三忠于”的提法开始流行。

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军队干部大会上高呼口号：“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此，“三忠于”成为盛行一时的政治口号。

“四无限”指：“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1967年12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学用结合，立竿见影》，其中提出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此后，这“四个无限”成为一个固定语。

“四个无限”还有一个版本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忠于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三忠于”和“四无限”这两个词，经常配套使用，成为一个词组。可以认为，“三忠于，四无限”这一词组的形成过程，与“忠字化运动”是同步的；或者可以认为，“三忠于，四无限”就是“忠字化运动”的核心思想。

1971年11月，毛泽东批评说：“三忠于，我就不懂。你们开会讨论一下，把不适当的名词、形容词废掉，不要搞了。”<sup>1</sup>这是清醒之言。当然，已是后话。

## 二、“忠字化运动”的典型活动之一：早请示、晚汇报

革命格言曰：“早晨向毛主席请示，工作有方向，一天战斗不迷航。晚上向毛主席汇报，心明眼亮，浑身上下增力量。”说的就是“早请示、晚汇报”。

“早请示、晚汇报”，大概是从宗教仪式中获取的灵感。

“红八月”里就有类似的场面，只是没有广泛开展起来。

“早请示，晚汇报”是北京针织总厂的发明。1967年11月17日，中央转发了《中国人

<sup>1</sup>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六卷，第419页。

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

大造学习声势，建立学习组织，健全学习制度，布置学习环境。运用上班向主席请示、下班向主席汇报（集体学习语录），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办学习班，召开讲用会等形式，向革命职工和家属，广泛宣传毛泽东思想。在较短的时间内，掀起了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高潮。工人们说：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心明眼亮有方向；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检查工作和思想。生产中看看车头镜（语录牌），干劲猛增长；交班交语录，互相关心互相帮。

1

“上班向主席请示、下班向主席汇报”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早请示、晚汇报”。

“早请示、晚汇报”的大致情形是：早晨，手持毛泽东语录，面向毛泽东像，请示一天的工作，表示干好革命工作的决心；晚上，手持毛泽东语录，面向毛泽东像汇报当天的工作和思想情况，反思自己思想中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之处，向毛泽东忏悔、表决心。

韩爱晶回忆说：“当时叶群在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里以‘三忠于’‘四无限’”为名推广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的活动。在北京基本上已成定式，在单位甚至在家庭里，人们早上面对毛主席像请示当天工作，晚上向毛主席像汇报。在做‘早请示’‘晚汇报’时，手举毛主席语录本，口中先颂：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sup>2</sup>

“早请示、晚汇报”是在工宣队、军宣队的鼓动下流传全国的。

“早请示、晚汇报”可谓是最盛大的祈祷。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梁源法的组诗《红卫兵战斗的一天》中，包括《早请示》、《天天读》、《大批判》、《晚汇报》，从这些诗歌中可以看出早请示、晚汇报的情形——

<sup>1</sup>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五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 1968 年 1 月编印。

<sup>2</sup> 《清华蒯大富》，第 328 页。

《早请示》：天朦胧，夜色浓。红卫兵起床早，脚步踩得大地动。//冒着飘飘飞雪，顶着呼呼北风，哪里去？回答一声：东方红！//啊，毛主席像前，一片火红！火红的语录火红的灯，火红的心儿在跳动。//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再唱一曲《东方红》。一腔豪情一腔血，最高指示齐声诵。//毛主席啊毛主席，红卫兵对您无限忠诚。您叫干啥就干啥，伟大教导刻心中……//歌声冲散了雪片，豪情吓退了北风，夜色悄悄溜走，看！已是东方红！

《晚汇报》：夜深了，人静了，毛主席像前啊，红灯高照。//看，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非常非常健康，招手向我们微微笑，红卫兵啊，多么幸福多么自豪！//整齐队伍，戴好军帽，快向毛主席来汇报：攻下了多少“私”字的碉堡，又把多少山头削平，今天啊又写了——多少教育革命的大字报？//毛主席啊毛主席，一切成绩归于您领导。万里长征刚迈步，铁流滚滚向明朝！<sup>1</sup>

北师大数学系革委会“井冈红旗”在《早请示、晚汇报，一帮一、一对红》一文中，也记述了早请示、晚汇报的情形：每天清早，起床铃声刚刚响过，数学系广大师生便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声，来到毛主席塑像前，向我们伟大领袖请示一天的工作，不管寒风怒吼，不管冰封雪飘，不管是平时还是星期天，早请示晚汇报从不间断。<sup>2</sup>

我记得，当年我们村子里，专门在村头修建了“祝愿台”（形类高大的影壁或屏封），上面画着毛泽东的画像，作为“早请示、晚汇报”的专门场所。

“早请示、晚汇报”甚至传到了国外，为毛泽东的崇拜者所效仿。

缅甸共产党中央高级干部的杨美红介绍说：当时缅共所在之地全都挂的是毛泽东和林彪的画像。不但挂像，每天还必读毛主席语录，要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sup>3</sup>

<sup>1</sup> 红卫兵文艺》1968年第5—6期合刊，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主办。

<sup>2</sup> 《教育革命》1967年第9期，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编印。

<sup>3</sup> 杨奎松：《“中国道路”的推广与夭折》，见《谈往阅今——中共党史访谈录》，第210页，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

### 三、“忠字化运动”的典型活动之二：忠字舞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游戏，“忠字舞”就是革命游戏中的“亮点”。

某报上的一则通讯说：“77岁的王大娘，在旧社会饱受地主老财的迫害，受封建制度的迫害，从小缠足，在新社会重新焕发了青春，人老心不老，依然每天坚持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尽管自己缠过小脚，走路有时都走不稳，但在跳忠字舞时却极其认真，一丝不苟，以此表达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心……”从1968年年中开始，一种以表达无限忠于毛泽东为内容的集体舞——忠字舞，从东北兴起，流行全国。“忠字舞跳起来，春风满怀情如海。忠字刻在心坎上，人人都把忠字爱！”<sup>1</sup>“上至八十三，下至手来搀”（民谚）。一时间，城市的广场、农村的场院、军营的训练场以及大专院校的操场，到处可见跳忠字舞的人群。

跳“忠字舞”时，舞蹈者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配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歌颂毛的歌曲，做出与歌词相应的舞步、手势等动作。“忠字舞”吸收了民族舞的基本动作，经典动作是双手从胸前向上扬起，表示从心底发出的对毛主席的热爱，另外还有指方向、挺胸膛、挥拳头、掏心窝、踢坏蛋等表达造反动作的舞蹈姿式。

“忠字舞”将革命的价值观和有民族特色的娱乐形式有机结合，内容是革命的，形式是民族的，呈现出极左内容与极老极土形式相结合的奇异情形。

“忠字舞”是文革舞台上的一朵荒诞之花。

韩少功说：人们在广场上、大街上、操场上乃至乡村的禾场上载歌载舞欢腾雀跃，跳忠字舞，以表现他们对形势好转的庆祝，还有对革命及其领袖毛泽东的忠诚。全民皆舞的景况如疯如魔。……这种活动受到当时多数人的热烈欢迎，是因为人们当时文化禁限森严，没有迪斯科和恰恰舞，没有巴黎时装表演和世界杯足球赛，青年人的活力缺乏发泄和释放

---

<sup>1</sup> 晓声：《忠字歌》（1968年6月创作），《战地黄花（八一八诗选）》，第24页。

的空间，忠字舞不能不成为他们一个难得的机会。随着他们对这种活动的卷入，歌词含义逐渐变得不怎么重要，就像好吃的面包贴何种标签不重要一样，鲜艳的服装，动听的旋律，学习技能的好奇，新结识的伙伴，竞赛胜利的喜悦，异性动人心魄的肢体线条，更能使红光满面热汗淋漓的男女们内心激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忠字舞就是那个时代的迪斯科和恰恰舞。……忠字舞还悄悄推动了各种异端文艺的卷土重来。……芭蕾、秧歌以及各民族舞蹈的知识技能在革命的名义下——得到吸收和推广。……舒曼的练习曲或者柴可夫斯基的G大调协奏曲也在青年人中间流行，被急需革命文艺功绩的政治官员们心情复杂地默许……<sup>1</sup>

#### 四、“忠字化运动”的典型活动之三：语录操

1950年代，中国编排和推行广播体操，组织工人、学生、军人和机关干部等群体在规定的时间内，听着广播上的乐曲和指挥，做统一的动作。广播体操实现了个人身体与革命集体的结合，既促进了全民健身，又培养了集体主义精神。

文革开始不久，为了“让毛泽东思想占领广播操阵地”，北京体育学院创编了毛主席语录操，简称语录操。这套语录操共六节，每一节都以毛主席语录命名：第一节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动作主要是上肢运动，双臂上举、挺胸、抬头，表现对党的无限信仰和崇敬。第二节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动作是扩胸运动。第三节是“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动作是全身运动……。语录操突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一思想，在做操时，高声读唱毛主席语录，用体操动作和舞蹈造型表现对毛主席的热爱、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体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造反精神。大家做操时，嘴里念念有词，情绪慷慨激昂。语录操使身体与政治的结合更加紧密。

1967年11月，国家体委系统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红色宣传员编印了《毛主席语录操汇

<sup>1</sup> 韩少功：《暗示·忠字舞》第53—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编》(16开本),收入包括北京体育学院创编的毛主席语录操在内的四套语录操,分别为普及版、中学版、小学版等。书中通过图片和详细说明,对语录操的动作进行规范、演示。这本书出版后,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报报刊上选载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宣传推广,使得“语录操”在各地流行。

## 五、“忠字化运动”中的三个典型文案

### 文案1:《忠》(对口词):

东方红,太阳升。举红旗,望北京。面对朝阳把誓宣,永远忠于毛主席。忠!忠!忠于毛主席是人生的目的,是生命的灵魂,是行动的准则。忠于毛主席是革命的需要,是时代的要求,是无产阶级利益的需要。高举红旗我表忠,热血沸腾心潮涌。永远忠于毛主席,千秋万代一个忠。忠!忠!为忠于毛主席而生,最有意义!为忠于毛主席而战,最大幸福!为忠于毛主席而献身,无尚的光荣!心往忠字上想,劲为忠字上用,血往忠字上流,行动往忠字上落实。忠字不牢,江山难保,忠字不立,资产阶级复辟。革命前辈靠忠字打天下,今天我们革命战士靠忠字保江山。忠,一个心眼忠于毛主席,斗志昂扬心更红!忠!一个心眼忠于毛主席,狂风恶浪仍从容!永远忠于毛主席,关键时刻向前冲。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葆青春万代红。对毛主席忠不忠在于公,公不公在于用,用不用在于行动。狠抓对毛主席的态度,大搞思想革命化,这是对毛主席最大的忠。忠!忠!忠于毛主席,是咱们无产阶级的本色。忠于毛主席,是思想革命化的最高标准。忠于毛主席,要有自觉的忠,要有彻底的忠。忠于毛主席,不讲时间,不讲条件,活到老,学到老。忠于毛主席,天塌地裂志不动,洒尽热血写个忠。忠!忠心献给毛主席,贫下中农斗志贯长虹。忠!忠心献给毛主席,铁打江山万代红。千锤百炼铸忠心,赤胆忠心干革命,永远紧跟毛主席,永远革命

永远忠，永远革命永远忠……<sup>1</sup>

## 文案2:《无限忠于毛主席十三条措施》

一、生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战士，死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身。把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和伟大实践铭刻在心坎上，把最高指示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毛主席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干。毛主席指向那里，我们就打到那里。谁敢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坚决和他拼到底。

二、到校第一件事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在毛主席像面前做早请示，高唱《东方红》。

三、每天坚持天天读，大学大讲大用大背大唱《老三篇》，随时狠斗“私”字一闪念，彻底改造世界观。

四、开会、上课、出操，首先有针对性地选学或背诵毛主席语录，大会开始唱《东方红》，结束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五、课前学习语录，接受毛主席指示；课文用语录，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课后对照检查是否听毛主席的话。

六、积极开展“一帮一，一对红”，写信用语录，谈心赠语录，接电话用语录，见面共同背语录，促进互学互助。

七、每天放学前，坚持向毛主席晚汇报，对照毛主席的教导，向毛主席汇报一天的思想、工作、学习情况。

八、桌前建立座右铭，班内建立语录板，要有针对性，经常对照检查，反复落实，根据形势任务和现实思想进行更换。

九、大唱毛主席语录歌，做到“五前一路”（上课前、吃饭前、出操前、开会前、睡觉

---

<sup>1</sup> 《红色宣传兵》第1期，北京市通县农代会1968年12月编印。为行文简练，这里剔除原文中“甲”“乙”二字。

前，走在路上) 唱语录歌。

十、向英雄李文忠学习，做到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主席像章永远戴在身上。毛主席永远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十一、睡觉前，组织全家学最高指示，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十二、进一步搞好课外毛著学习小组，狠抓落实，狠抓成效，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在百分之百的时间里起作用。

十三、要斗私批修。见到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现象和行为，要坚决抵制，叫私字无藏身之地，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让公字挂帅，大大发扬，人人颂扬。<sup>1</sup>

### 文案3:《一日生活毛泽东思想化实施办法》

北京石景山中学制定了《一日生活毛泽东思想化实施办法》。全文如下:

#### 一、早祝愿(早操前单独施行)

分队列队，面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或面向东方。

1. 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永远健康!

2. 齐声歌唱革命颂歌《东方红》。

3. 齐声朗诵和背颂毛主席有关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如老三段、新三段、“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等，林副主席题词“高举毛泽东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4. 手捧红宝书宣誓。领队先喊“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庄严宣誓:”全体人员接着齐喊“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

---

<sup>1</sup> 《探索者》第18期(1968年5月)，南京市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教育革命探索队主编。

## 二、队列行动语录化

1. 指挥员下达各种口令，全体人员齐喊。如：

立正：毛主席万岁！ 稍息：不怕疲劳！

向左看齐：向解放军学习！ 解散：提高警惕！

向右看齐：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向右转：打倒刘少奇！

向前看：心向毛主席！ 向左转：保卫毛主席！

齐步走：紧跟毛主席！ 坐下：纪律严明！

跑步走：勇猛前进！ 起立：执行命令！

立定：立场坚定！ 向后转：要斗私批修！

2. 队列行进时，不喊一二一、一二三四等口号，要喊毛主席语录。

①指挥员指挥用语录，不喊一二一，要选用毛主席语录，如“整齐划一，令行禁止”、“团结一致，同心同德”、“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②指挥员喊“最高指示”，列队人员接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指挥员喊“毛主席指示”，列队人员接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指挥员喊“毛主席教导”，列队人员接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指挥员喊“向李文忠学习”，列队人员接喊“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指挥员喊“全世界人民”，列队人员接喊“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完岁！”。指挥员喊“光荣伟大”，列队人员接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3. 讲评（操课结束，或其他集体活动进行完后实施）

①有的放矢选学有关语录、最新指示等。

②齐唱语录歌。

## 三、开饭语录化

1. 向饭堂行进中大唱语录歌、革命歌曲，呼革命口号。

2. 列队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3. 齐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4. 选学几段关于学习、关于为人民服务、关于节约闹革命等有关语录。

四、小组、分队（或代表团）单独会议、学习、讨论等集体活动必须：

1.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2. 大唱革命歌曲，革命颂歌。
3. 有针对性地选学有关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
4. 领队（或值班员、代表）汇报一天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情况，汇报完后，列队人员齐声背诵“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5. 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6. 解散后，集体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革命口号。<sup>1</sup>

## 六、“忠字化运动”是文革兴起的“个人崇拜”的一部分

“忠字化运动”，一方面是在中国大地上兴起多时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大背景下开始起来的，另一方面，它的出现，将个人崇拜推向一个新高潮。

从延安整风开始，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就大力宣扬毛泽东，开始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人统计，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刘在七大上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去。同年9月，赫鲁晓夫上台。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全盘否定斯大林，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问题，一方面引起了中共的警惕，一方面大家对全党全国人民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又有些辩解和维护。

---

<sup>1</sup> 笔者保存的传单。

1958年3月，中央召开成都会议。会上毛泽东说：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sup>1</sup>

刘少奇从中共八大开始，鼓吹毛泽东的劲头不大了。

林彪后来居上，成为新时代的第一吹鼓手。他创造并使用了大量的夸赞之词、奉承之语。他说：“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在全国、在世界有最高的威信，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敢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周恩来赞扬说：“林彪同志对于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

在全党推动下，在权力支持下，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自发的朴素的崇拜，被提升到至高无上的高度。“领袖至上”的观念在全民心中树立起来。

文革开始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空气日益高涨。

“学习毛泽东！崇拜毛泽东！捍卫毛泽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中国形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崇拜人群。文革初期，崇拜的花样之多、之新、之丰富，空前绝后，光大了中国的“颂圣文化”，可编一本“崇拜宝典”。比如：

——红宝书崇拜、语录崇拜。毛泽东的文章被称为“雄文”（郭沫若语，不知道有没有“雌文”）。毛泽东的著作叫红宝书。全国人民人手至少一册红宝书，随身携带。买毛

---

<sup>1</sup>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69页。

泽东的书叫“请宝书”。专门装红宝书的包叫“语录包”。“咳唾落九天, 随风成珠玉”(李白)。毛的只言片语, 被称为“最高指示”“最新指示”。毛的语录一发表, 即为“特大喜讯”, 无论深更半夜、刮风下雨, 都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 真可谓“出一言而盈廷称圣, 发一令而四海讴歌”。1966年6月13日, 中共中央指示: 无论高小或初小都要学习毛主席著作, 初小各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 高小可以学老三篇以及其它适合小学生思想政治水平和语文程度的一些文章。大寨人说: “毛主席的书是宝中宝, 祖祖辈辈离不了; 有了这个宝中宝, 无产阶级专政牢又牢; 有了这个宝中宝, 地能移来山能摇; 有了这个宝中宝, 永远和党心一条。”<sup>1</sup>革命谚语说: “毛主席的话, 千句万句都记下。一句能顶一万句, 毛主席叫咱干啥就干啥。”“饭可以不吃, 觉可以不睡, 毛主席著作不可一日不学。”毛主席语录成为大家说话、做文、办事、辩论中最常用、最大量引用的语言。“语录牌”密集地张贴在城乡各地, 树立在车间地头。许多地方开展背语录比赛。在陕北地区, 甚至出现“语录岗”——在村头设立岗哨, 通过的人必须背诵一段语录才能通行, 这使得许多没有文化的婆姨不敢出门。

——毛泽东画像、塑像崇拜。全国人民人人佩带毛像章。城镇的广场上树起毛的大型塑像。每户人家都在以前张贴祖先画像和摆放神龛的地方张贴毛的画像、摆放毛的小型塑像。毛泽东像成为全国各地最常见的景象, 画像周围通常还有一圈“忠”字环绕。“帐篷挂上毛主席像, 四海为家建国防; 工地挂上毛主席像, 移山填海有力量; 工事挂上毛主席像, 万里江山变铜墙; 人人佩带毛主席像, 颗颗红心向太阳。”<sup>2</sup>污染毛泽东画像、将印有毛泽东形象的邮票倒贴, 都被认为是不敬甚至是反革命行动。上海《文汇报》的徐铸成在1968年5月6日的“思想汇报”中写道: “4月30日晚上, 里委专政小组的同志到我家查看我的书籍、笔记本, 看到我孙子(不到四岁)所收藏的毛主席相片有部分折损, 有些画片后面还被涂抹。当即把这部分拣出, 并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教育。我认识这错误是严重的,

---

<sup>1</sup> 《人民日报》1968年1月21日。

<sup>2</sup> 《人民日报》1967年12月4日。

是对伟大领袖犯的严重罪行。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购备了伟大领袖相片几张在家中挂起，以后，不断对孙子谈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及领导革命的故事，想从小培养孩子对领袖的热爱。以后，每次同他上街，他总要到新华书店去，看到新出的领袖像就要买。我只看到他热爱领袖的一面，没有注意小孩的顽皮，没有经常察看。上月，我老婆发现他藏的领袖照片又皱折，曾告诫了他。有一次，我老婆为了服侍中风的老母，没有看好小孩，回房时，发现他把蜡笔在领袖照片后涂抹，当即严肃加以制止，以后他就没有再这样过。总之，是我不该放任孩子收藏伟大领袖的相片，又没有注意防止小孩的顽劣举动。这是我对伟大领袖以及世界革命人民犯了罪。”<sup>1</sup>

——独特的崇拜颂语。称颂毛泽东为“天才”、为“红太阳”，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对毛主席效忠的流行语言是“三忠于四无限”，还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称赞毛泽东思想“光焰无际”、是“观察一切事物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是继马、列之后“第三个里程碑”，表示要“把毛泽东思想融化在血液里”等。最美妙最动听最肉麻最有特色的颂语，出现在各地区、各单位给毛泽东的致敬电中——当时官方及群众集会，一个重要议程是给毛泽东发致敬电，这样的致敬电数以万计。“毛主席啊，毛主席！……昆仑山高，您光辉的形象更比昆仑山高；青海湖深，您天大的恩情更比青海湖深。以祁连森林作笔，用青海湖水当墨，也写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感激，无限景仰！”<sup>2</sup>“千里草原当琴盘，万条清泉作琴弦。天山儿女用十三个民族最美好的语言编成歌，支支歌儿献给您。博格达峰高啊，再高也有个顶；阿勒素草原宽啊，再宽也有个边。您对我们的恩情啊，千秋万代唱不完。把天下的树都变成笔，把天下的水都变成墨，让天下的人都变成诗人，也写不完歌颂您的诗篇。”<sup>3</sup>

——独特的崇拜仪式。天天唱歌颂毛泽东的歌曲（有人统计，歌颂毛泽东的歌曲有530多首。还有人说，中国音乐家曾创作了超过一万首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天天读毛泽东的

<sup>1</sup> 《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第69—7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0月版。

<sup>2</sup>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年8月12日）。

<sup>3</sup>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乌鲁木齐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9月5日）。



著作，背诵毛泽东的语录警句，传达毛主席指示不过夜。做语录操，跳忠字舞，建忠字墙，举语录牌。乡村里，家家户户的门上都用油漆刷上了美术体“忠”字，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献忠心表忠心。说话引用毛主席语录，书本上印刷毛语录时使用黑体字。播音员念毛主席语录、表演者朗诵毛诗词时，都带有一种黑体字的腔调。墙上、汽车上、飞机上，乃至信封信纸、暖瓶、水杯、箱子等生活用品上都书写毛主席语录。有的甚至在棺材上写毛主席语录。2007年4月10日《新京报》报道，北京某建筑工地挖出一口棺材，上面写有毛主席语录。

文革时的中国，毛泽东的思想成为一个笼罩性的思想，是一个包医百病、解决全人类问题的豪华理论。革命格言曰：“手不离毛主席的书，嘴不离毛主席的话，行动不离毛主席的思想，心不离毛主席的教导。”“要把天化为毛泽东思想的天，把地化为毛泽东思想的地，把人化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把未来化为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的未来！”

## 七、中共中央批评和制止“忠字化运动”

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操等，是当时“忠字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68年上半年开始，毛泽东、周恩来、江青、康生等对这些做法提出了批评——我猜想，一定是老人家发话了，不然这些人为什么早不批评与制止？

谢静宜回忆说：1967年后兴起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做“语录操”，主席是不知道的。后来当我无意中谈起这些事时，主席说：“荒唐”，他皱起眉头陷入沉思。1968年春主席说：“到处都挂我的像，连战士的宿舍也挂我的像，我去散步时发现的，我问他们：‘你们敬的是什么神呢？’”<sup>1</sup>

1968年4月7日，周恩来在接见国家计委军代表和大联委的讲话中说：用毛主席语录作语录操，这是不对的，怎么能把语录当一二三四？警察在街上把红宝书当作指挥棒来指挥，那就

---

<sup>1</sup> 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第168、170页。

不好了。<sup>1</sup>

4月9日，在接见部队代表时，江青批评说：“语录操你们经过批准没有？怎么没有批准就搞起来了？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庸俗化，不要降低、歪曲主席思想。”黄永胜说：“左右转也喊毛主席语录。”周恩来说：“交警拿语录作指挥棒，这怎么能行呢？”林彪说：“把语录当指挥棒，怎么能把宝书当指挥棒呢？”江青说：“不能用语录当指挥棒，不能用语录代替一三四。既然《战友报》登了，就要检查。”<sup>2</sup>

康生在一次讲话中也批评说：广播操改成语录操，把严肃的毛泽东思想变成一三四，这是侮辱。<sup>3</sup>“早请示、晚汇报”的做法同样受到江青等人的训斥。1969年4月，江青在“九大”开幕之后的一个讲话中说：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这一套，不是宣传毛泽东，而是丑化毛泽东。康生插话说：这是强迫人民用宗教、迷信的那一套庸俗化毛泽东思想。

1969年6月11日或12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稿，批示道：“照办。”这个文件12日发出。文件指出：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宣传毛主席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现象。有的挥霍国家资财，不经批准，用烧瓷、石膏、塑料、金属等材料，塑造各种毛主席像；有的制作毛主席像章越来越大，样式繁多，质量有差；有的随意随处张贴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有的甚至设置“宝书台”、“忠字室”、“敬仰馆”，跳“忠字舞”、到处贴“忠”字，大搞“忠字化”运动。这类形式主义的做法，虽则出自好意，却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有损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在政治上很不严肃。为此特提出以下改进意见：

一、各级领导要积极引导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思想革命化，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

<sup>1</sup> 《云水怒活页文选》，第28—29号合刊（1968年4月26日），浙江师范学院《云水怒》编辑部编印。

<sup>2</sup> 林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接见63、69军的重要指示（1968年4月6日、9日），《万山红遍》第65期，北京东百《万山红遍》编辑部1968年6月12日编印。

<sup>3</sup> 《中央首长对外事工作的指示》，见《文革简报》第四期（1968年5月25日），（苏州）工联总侨独立团编印。

二、重申中共中央1967年7月13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塑造、印制毛主席像，必须经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讨论批准。

三、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

四、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禁止乱贴滥用，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

七、不要“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不要搞‘忠字化’运动”。<sup>1</sup>

至此，“早请示、晚汇报”逐渐得以制止，“语录操”、“忠字舞”成为历史遗迹。■

---

<sup>1</sup>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六卷第 255—256 页。

【序与跋】

## 《王大宾回忆录》的新视角、新观点（序一）

文 研

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五十年的日子，很高兴看到《王大宾回忆录》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反思文革的新视角、新观点。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毛泽东发动群众、介入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的一场政治运动。反思这场运动，不仅要研究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何以能发动这场文革，还要研究毛泽东怎样审时度势，发动和领导这场运动的，他的战略目标、战略部署，对大势的掌控，以及主动进攻、被动应对、策略转换等等。总之，不把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搞清楚，对文革的反思和回忆就容易失实走偏。这也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它。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战略目标，是要打碎刘少奇掌控一线所建立与运作的权力系统。毛泽东要重回一线，重建他能亲自掌控与运作的新的权力系统，在此过程中发现和培养坚持执行毛泽东主张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接班人，保证其路线的传承。毛泽东认为，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已不能用具有合法程序的会议来实现，而必须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毛泽东在完成发动文革的准备，制定出“5·16通知”后的十年中，有三个战略运作阶段：1966年5月16日至1967年1月，为破坏旧秩序，打碎刘少奇掌控一线的权力系统阶段；1967年1月至1969年4月九大召开，为建立新秩序，以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形式，重建新的权力系统的阶段；1969年4月至1976年9月，为巩固文革所建立的新秩序阶段。

《王大宾回忆录》根据这个认识，回忆和反思了他的文革经历。王大宾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北京地质学院在文革中成立的“东方红公社”，以及由他发起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成为文革破坏旧秩序阶段反工

工作组派别的旗帜和先锋队。1967年3月5日，取代朱成昭成为地院东方红一把手的王大宾，被毛泽东誉为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

1966年，以北大、清华、地院为首的59个大专院校，在文革发动、动员群众破坏旧秩序的不同时段起了带头与示范作用。而抓典型引路，正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方法。

“5·16通知”下发后，毛泽东在寻找发动群众的突破口。5月23日，吴传启等人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贴出了批判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时任学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的杨述的大字报，但并不具有动员群众的典型、样板作用。5月25日，聂元梓等7人在北京大学贴出了批评宋硕、陆平、彭珮云的大字报。毛泽东得知后，立即批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果如所料，一石激起千重浪，全国沸腾，学校师生批判学校党委领导的热情高涨。北大的四清运动，以聂元梓等人为代表的积极分子，与彭真支持的陆平为首的校党委，产生严重分歧与对立冲突。打压他们的彭真，在“5.16通知”传达时已被点名批判，给了聂元梓等人勇气和批判方向。对北大四清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应早已知晓。张恩慈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函，毛泽东已有批示。北京大学的地位与影响不言而喻。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被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文革破坏旧秩序阶段，作为发动群众投入文革的第一把火，其重大的作用与影响确是不争的事实。

毛泽东欲擒故纵，使得刘少奇误判文革运动，采取派工作组的方式搞了一场“反右派”运动（有的工作组称为“抓游鱼”等）。他还派王光美做清华工作组的顾问——实际上让她掌控清华工作组，介入清华文革运动，意欲再创类似四清“桃园经验”的“清华经验”。王光美在清华五十天，指导工作组打压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和教师，结果搞出七八百名右派，其典型人物就是蒯大富，所以当时清华的右派也被称为“蒯派”。清华这次“反右派”运动，成了1966年8月1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压倒刘少奇的最后一根稻草。毛泽东决定，刘少奇不再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决定撤出领导文革运动的工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信，对造反的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中国大陆的人民群众，自此在文革前期有了毛泽东领导下的结社自由。毛泽东更在

1966年8月18日穿上绿军装，戴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宋任穷女儿宋彬彬献上的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群众，公开表达对红卫兵造反的支持。蒯大富对抗王光美主导的工作组，清华大学的地位与影响，无疑是毛泽东用来打破刘少奇一线主导的旧秩序的利器。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陶铸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时出现了保工作组的保守派群众组织，与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严重分歧与对立。在文革的这一时段，被薄一波“6·22批示”打压、视为“右派”的北京地质学院的少数师生，以平民子弟为主体，在1966年8月17日成立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他们以鲜明、激进的反工作组姿态，第一个组织带领上千人的队伍，到地质部机关上访请愿，震动京城，亦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肖力，及时了解掌握了这一时段地院文革运动的态势。9月6日，联合北京高校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以地院东方红为头的“首都三司”成立。“首都三司”代表的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之初虽然处于少数派地位，但它符合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代表了文革第一阶段动员群众破坏旧秩序的造反大方向。经过1966年8月、9月的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保工作组的保守派群众组织与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已阵线分明，发展到互不相容、激烈对抗的局面。1966年9月23日，地院东方红与保守派组织“斗批改兵团”，为争夺学院广播台的控制权发生的肢体冲突，被视为文革中发生在北京高校的第一场武斗事件。时任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首先赶到北京地院处理这一事件。但吴德不能平息事件，无法摆平双方的对立冲突。吴德说：“这是周总理的指示，但他们根本不听。”随后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亦派关锋、戚本禹到地院处理这一事件。在地院现场，吴德向戚本禹传达周总理指示后，戚本禹说：“这个办法不行，你们要支持‘东方红’，他们是左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随后有林彪1966年国庆讲话，《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掀起全国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高潮。保守派组织迅速瓦解，反工作组造反派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多数派。依靠发展左派队伍，瓦解保守派组织，团结大多数群众，向刘少奇的权力系统造反，成为当时毛泽东处

理分裂与对立的各派群众组织的方针、政策。地院东方红也随之成为这一时段北京高校造反冲杀出来的新典型、新领头羊。王大宾代表地院东方红，被毛泽东视为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真实反映了地院东方红、“首都三司”在文革破坏旧秩序阶段的地位与影响。《王大宾回忆录》记述的这一史实，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展开，以更完整地还原文革历史的真相。

在许多记述北京文革的著述中，都会拿北京高校造反派组织1967年后所谓“天派”、“地派”的斗争说事。据我了解，被视为“天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北航红旗负责人韩爱晶，与视为“地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地院东方红负责人王大宾，他们都不承认北京存在对立的有组织的天派、地派。《王大宾回忆录》表述的观点，我认为符合当年北京高校文革的真实情况。

1967年，文革运动已进入毛泽东建立新秩序的新阶段。争夺在新的权力系统中的地位，主要表现为军队、干部与群众组织三者之间的博弈。分歧、冲突、对立已不像第一阶段那样两军对垒，阵线分明，左派、保守派已难以认定、判断。毛泽东为了实现第二阶段的战略目标，必须面对现实，权衡利弊。面对周恩来支持的老师、副总理们在1967年2月表达的强烈不满情绪，毛虽大为震怒，最后亦不能不妥协，表示出团结的意愿，并发社论宣示正确对待干部的方针。同时还发表《红旗》评论员文章，将打击干部一大片的过错，诿之于刘少奇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面对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在军队支持下，对王力公开讲话宣布而实为毛泽东决定的处理武汉问题方针的激烈反抗，毛泽东改变以往依靠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群众的方针，而代之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平等大联合的方针。毛泽东同时批评“揪军内一小撮”，果断处理王力、关锋等人，化解军队的不满情绪。当年，王大宾对毛泽东文革战略阶段与战略方针、部署的转换，是认识不清楚的，头脑膨胀、犯错误是必然的。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五大学生领袖”谈话中，批评造反派组织多中心即无中心表现，认定山头林立的众多造反派组织，已发展到谁的话也不听，实已成为建立新秩序的阻碍，起了破坏作用。《王大宾回忆录》正是依据这样的认识，反

思1967年后，北京高校反工作组造反派组织之间发生的冲突事件，反思地院东方红与北大新北大公社于1967年4月在民族文化宫展览问题上的冲突。王大宾后来主张东方红应专注学院运动，不要介入外单位运动的想法是好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已骑虎难下，无法掌控。王大宾对毛泽东召见他们有自己的反思，认识到文革的实践证明自己不行，最终被毛泽东“不要”是必然的。回忆录中这些理解与评述，值得文革亲历者和研究者深思。

以孔丹为头的“西纠”在成立之初，与到地质部机关上访请愿的地院东方红发生严重的对立与冲突。事过近50年，孔丹在回忆录《难得本色任天然》中，认为他们这些“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的老红卫兵，与地院东方红王大宾这样的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具有本质的区别”。王大宾在回忆录中批评了孔丹的这一说法，认为其骨子里根深蒂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左右他的思维与判断。而孔丹在书中表白，当年他是不同意“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狂热鼓吹封建血统论的对联的。

然而，孔丹在文革后可以影响上层的政策，区别对待同样参与文革的人。《王大宾回忆录》记述了他为何取代朱成昭，由二把手变成了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叶剑英对文革的态度，如何通过其女儿叶向真影响到朱成昭，成为他从听从中央文革转向怀疑、批评的主要动因。叶向真与朱成昭等人虽同被打成“叶、朱反革命集团”关进监狱，但却有完全不同的命运与结局。王大宾感慨评说：“有人对《西游记》的评论说得好：有背景的妖怪都被收走了，没有背景的妖怪就被孙悟空打死了！”

王大宾对朱成昭人生命运的感慨，亦是对自己人生命运的感叹。文革运动中，能打上王大宾个人印记的大事件，是奉命参与并负责把彭德怀元帅从成都揪回北京。《回忆录》详述了王大宾参与这一事件的过程与细节，澄清了过往许多书籍文章关于这件事的不实、不全的描述，还原了历史真相。这是《王大宾回忆录》的一大看点。在这一事件中，王大宾一方面通过与彭德怀的接触交谈，同情彭德怀的处境，并在认识上产生共鸣，为此不同意中央揪彭决定，派人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申述他们的意见，但却遭到批评。另一方面，最终执行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和成都军区派出干部一起，负责带领



地院东方红的战士，把彭德怀安全护送到了北京。这两方面的事实，都是客观存在。令王大宾不解的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可以对客观事实有选择地认定、采信，并据此作出处罚。在巩固文革运动新秩序的阶段，发动了清查“5·16分子”的运动，王大宾被认定为同情彭德怀，抗拒执行中央从成都揪回彭德怀的决定。据此认定为王大宾的主要罪行，将其打成“5·16分子”，关押审查四年之久。而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又将王大宾逮捕关押五年。至1983年8月18日，根据陈云“怎么只判天派？地派也要判！”的指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指控“王大宾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期间，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被认定的主要“罪行”，就是他带领地院部分学生，将彭德怀挟持，押到北京，“使彭德怀同志人身遭到迫害”。为此，王大宾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面对完全不符合1979年7月6日颁布、1980年1月11日生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的审判，王大宾只能感叹：“当时的我能说些什么？这就是政治。”

王大宾写出他在文革运动中亲历的事，并公开出版发行，值得欢迎。这为研究和反思文革历史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文献。我和王大宾一样，期待《王大宾回忆录》引起关注，期待人们的争议与批评。

2015年10月于深圳■

【要有光】

在杨海棠家的墙上，毛主席像挂了很多年了。（胡杰版画）



A/P 要有光 之十二

胡杰 2014.11

【要有光】

## 甘谷逃荒人杨海棠访谈

——你领上娃娃逃个命去

依 娃

受访人：杨海棠，79岁，陕西省户县涝店镇里贤村人。逃荒前为：甘肃省甘谷县杨家庄人。

时间：2013年9月8日

录音长度：23分钟

采访地点：陕西省户县涝店镇里贤村杨海棠家。

依：姨，你多大岁数了？

杨：七十九了，身体还可以。

依：你是哪里人？

杨：甘谷人，甘谷杨家庄。我是老三家的，她是老七家的。（注：兄弟两个都娶了甘肃来的逃荒妇女当媳妇）

依：来时候甘谷情况怎么样？

杨：报的多，打下的都报上去了，把人饿的。一天给人吃四两粮食，把人饿得受不了。最后还成了二两粮，炼钢铁的那年整个可怜的。

依：你去修过河吗？

杨：修过，我给人家做饭，爷，我啥都做哩。还给人家担粪，一早晨起来就担粪，给记几个工分。没有钱，记工分。

依：有没有到你家搜粮食？

杨：没有搜粮，人家把锅都搜上走了。没有粮食，没有粮食，一天只给上二两粮，都给国家报上了，人家得红旗哩。我爸死得早，我才五岁，我哥八岁，我妈给人家下地，给地主家做饭养活我们两个，可怜得很。人都是偷呀逮呀，没有吃的嘛，可怜的偷着吃。

依：偷什么？

杨：偷麦颗子吃。我不敢偷。一个女人家，半夜里不敢去处，人家让我出来，我才出来。

依：饿的时候吃什么？

杨：从队里的食堂打上一罐面汤一样的汤就那么喝。吃什么，女人做月子，刚生了娃娃，都不准在自己屋里做饭嘛。人都饿得吃麦糠哩，玉米芯、麦糠都吃上了。粮食打的少，报的多，给国家交粮食，就能得上红旗。

依：你那时候有奶水吗？

杨：有一点，大人吃不上，可怜的，人瘦干了。

依：那时候，你饿得肿了没有？

杨：爷，饿死人了。人吃那个榆树叶子，都吃的脸上肿了，脸肿得多大，明光光的。我在甘肃把罪受够了，你知道我怎么住？就住在猪窝里，用个草垫子当门。我妈给了我一个锅，火烧了几次，锅都烧漏了。我就在那里住着，我哥后来伐了些木头，给我盖了一点房。

依：你们那里有没有饿死的人？你看见的？

杨：看着了，我们村子里的。从河滩走过来，那里就躺着人就是饿死的人。没有人给埋，可怜得很，那时间。我的当家人（注：当时的丈夫），给队上干活去了，把腿压坏了。我有两个娃，留下一个男娃子，领上一个女子，就走了。

依：他干什么把腿砸了？

杨：给大队去拆房子，来是快过喇叭节了，队上说：“你去把那个房子拆，把那个木料拆出来。”结果就把腿砸坏了。我就给看也看不到，男人腿砸坏了，就没有办法了，还两个

娃哩。他才三十几岁，我的男娃子两三岁，女子才一岁多，我就把女子领上。

依：男娃叫个啥？

杨：男娃叫个秋军。女子叫个英娃。女子领来了，男娃给他留下了。

依：那个娃娃没有说：“妈，我跟上你去呀。”

杨：以前来过几次，再没有来过，再没有来过。

依：你走你男人让你走吗？

杨：人家让走哩？他说：“我这样子了，你领上娃娃逃个活命去。”是我哥出来找我嫂子，把我领来了，不然咱还没有本事跑，我嫂子是在家里没有吃的，就领上个娃先跑出来了。

依：你来的时候多大？

杨：也就是个二十五六岁的样子，领了一个女子出来。

依：是五九年还是六零年？

杨：就是正挨饿的那一年。我哥来陕西找我嫂子，就把我和娃娃领上。

依：你出来拿了点什么？

杨：没有，啥都没有。就两个手，牵引了个娃。

依：路上怎么吃？

杨：路上吃啥？路上就不吃就饿着。

依：你哥领上你怎么办？

杨：我哥领上我就要饭吃，走到哪里要到哪里，找我的嫂子。

依：你怎么找到这一家了？

杨：是我哥走到这里，把我卖到这里，安顿下，要饭要到这里了。

依：这里的人（注：你的丈夫）比你大多少？

杨：这是一大家子人，比我大得多，比我大十几岁，没有自己的娃。

依：你哥把你放在这里，能不能换些粮食？

杨：给两个钱！给了一百元，哈，那时候是逃命哩。把我给到这里，拿上些钱回去，家里还有我妈哩，要养活我妈哩。

依：你就留下了，过活上了，把娃娃养活上了？

杨：我到这里又生了三个男娃子，一个叫个文喜，一个叫文许，一个叫文青。这个老汉叫个茂许，王茂许人都死了。我现在跟着老小过着哩。

依：你哥找到你嫂子了吗？

杨：没有！没有！我哥又回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又来陕西找，结果看见娃娃在地上耍着哩，我嫂子在地里摘棉花着哩。那个娃娃一下就认出我哥了，就一下子把他大的腿抱着了，叫：“大！大！”。那是在周至县，娃叫“大”哩，一下子把他大的腿抱住了。我哥就把娃先领回去了，我嫂子以后政府领回去了。但是人家领回去就跑，领回去就跑。

依：你嫂子最后回去那没有？

杨：回去了，我哥来领了三四次，人家不愿意回去，我哥就把娃先领回去了。爷，我哥来了好几次来找我嫂子，给人家好说歹说。

依：你哥叫什么？

杨：我哥叫杨全福，我嫂子叫啥咱也不知道。我哥把人叫不回去，就先把娃领回去，来一次把我嫂子领回去就跑了，领了四五次哩。

依：你嫂子这里跟人了么？

杨：有，在这里留下一个女子，是这里这个男人的娃，就留下了。这个女子都五十多岁了，就在咱这附近住着，属牛的娃，在燕北住着。

依：你嫂子愿意回去么？

杨：她不愿意不行。我哥非要让回去，我哥见了就打，咋不打？我哥来领，她硬是不回去。

我哥领了几个人来领我嫂子，领着我兄弟。我兄弟来时候刚当兵回来，穿的那个黄衣服，威风得，把这里的男人吓的，就把我嫂子领回去了。我哥领上人来抢人来了。我嫂子

回去半夜又跑了，又抓回去……。别笑话我嫂子，是没有吃的，把女人饿的胡跑哩。没有吃的，受可怜哩。唉——！我嫂子回到甘肃生了两个男娃，三个女娃，又添了四五个娃了，人家不回来了。算是把婆娘领回去了。

依：有一阵政府让甘肃来的女人回去，你怎么办？

杨：他们让人回去，我手里有离婚证。我来的时候，在甘谷开了个证明，我拿来了。不然，他不敢要咱，黑人黑户人家不要。要了往回去送哩，人家没有送咱。我来受的可怜就多了。

依：你离婚那边同意吗？

杨：同意，不同意咱离婚不了婚。他不得动弹，连个柴都从地里背不回来，烧不成炕，娃娃冻得。他说：“你愿意就领上一个，不愿意就算了。”我就好心，给他把男娃子留下，把女子领上。

依：那个男娃来看你吗？

杨：人家也不来了，人家不认咱，路这么远，回去一次也不容易，要钱哩，咱也没有钱。

我这女子也不回去，和他大没有感情嘛。

依：你的娃娃们知道你是甘肃来的吗？

杨：给娃说那些干什么？不说，不说。

依：你知道这个人是谁？（注：我指着墙上的毛泽东像问）

杨：毛主席。我街道上十块钱买来的，毛主席。毛主席是干大事的，对咱好。

依：你说毛主席好吗？

杨：毛主席好，把人都解放了。解放的那一年咱知道。咱知道，咱还不知道？毛主席好。

现在好，还给点钱，不要公粮了才好了。老早哪里有钱？你做死做活哪里能见到个钱？在生产队能见到钱吗？可怜得很。■

【大饥荒】

## 一九六零年

陆 凌

谨以此书献给在1960年前后死于“三年大饥荒”的数千万中国农民

### 前 言

“不懂得历史就没有美好的未来”<sup>1</sup> ——温家宝

六〇年，中国历史上最为煎熬的一年。对于二十世纪大部分国人而言，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奶奶冯氏，生于1907年，青年守寡，一生艰辛，没齿难忘的却是六〇年。在我小时候，一群兄妹围坐在矮小的饭桌边，时有打闹，一旦有饭粒掉在桌上或剩在碗中，奶奶总是严厉地斥责我们：要是六〇年，非饿死你们！奶奶佝偻的身影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絮絮的话语很多都已随她而去，唯有这两句，却依然萦绕在我的耳边。

记忆中的表哥总是一副苦相，每次他到我家吃饭，父亲总是说，用大碗给他盛饭。长辈们说舅舅六〇年就饿死了，丢下舅妈和一群未成年的孩子在乡下苦苦挣扎。对于舅舅的事情，家人包括外婆，几乎从来不谈，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三十几岁就死掉了？不仅没有人说，似乎也没有人问。

这就是我的童年对于六〇年的记忆，星星点点，支离破碎，虽难以忘怀，却模糊不清。此后长大成人，离开家乡，为生计奔波，再也没有人和我提起六〇年。后来出国，教我们微观经济学的，是一位来自上海的教授。九十年代初，教授四十出头，他对我们说，六〇年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这本该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揭露，然而十分遗憾，面对启蒙，我依然懵懂，没有任何反应。如此又是近二十年过去了，我也人到中年。突然，某一天，电光

---

<sup>1</sup>温家宝：2012年4月27日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题词，《世界日报》2012年4月28日B1版



石火，童年的记忆猛然苏醒，我决心下点功夫弄明白，六〇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以上就是写作这本小书的个人背景和基本动机，纯属偶然，又似必然。我在大饥荒后的婴儿潮中出生，虽未亲历饥荒，却也感同身受。幼年时期，常感饥饿，营养不良，影响发育。我体味到一种历史责任，渴望把这段大饥荒的历史搞清楚。它似近却远，似是而非，扑朔迷离，经历的人不愿提，后来的人不了解。我要用简单通俗的语言把它写出来，告诉我的同龄人以及我们的后人：六〇年，在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与本人所受的正统历史教育完全无关。温家宝说，不懂得历史就没有美好未来。哈维尔说，活力社会，历史传承。《人物周刊》呼吁，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是诚实。<sup>1</sup>

我说，诚实面对，需要良知，更需要勇气。

## 六〇年

六〇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英国记者贾斯柏·贝克（左图），1996年发表了《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一书，在该书的序言中，他用白描的笔法，平实的语言，讲述了河南光山县一位65岁农民（1994年时——笔者注）的亲身经历，贝克生动的描绘制造出照片的效果，黑白的场景，凄惨悲凉，触目惊心。一张好的图片胜过千言万语，但我至今没有找到任何与大饥荒直接相关的照片。冯克在2010年发表的《毛的大饥荒》一书中说，除了用于宣传目的的照片以外，没有发现其它有关饥

荒年月的照片。<sup>2</sup>这里只好借用贝克的描绘来呈现当年的惨象，以下十段文字就像数十张照片，既有远景，又有特写，完全出自该书。原文是英文，本人是译者。

<sup>1</sup>《人物周刊》总第299期，封面

<sup>2</sup>Frank Dikötter-冯克：Mao's Great Famine-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第166-167页。中间插画页，Walker & Company, New York, 2011.

“六〇年是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最黑暗的时刻。两千多年前，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推翻了中国的第一个专制王朝——秦朝，秦朝统一并控制了多民族的古代中国。现在，中国再度被一个伟大的领袖统一，他就是毛泽东；在诞生过中国第一个王朝——商朝的肥沃的河南大地上，却处处是饿死的农民的尸体。

“在河南省光山县一个小村里，刘小花（音译），65岁，仍然能清楚地记起三十六年前的事情。这是1994年的一个下午，刘坐在一个小凳上，穿着已经褪色的蓝棉布裤褂，不时地抽烟，回忆着当时的情况。从她们村子里出来的路上，有几十具死尸，无人掩埋。荒原里还有死人；死尸旁，一些还活着的人，缓慢地爬着，在找野菜吃。水塘里，沟渠中，人们蹲在泥潭里，搜捕青蛙、采集野草。

“那是个冬天，非常冷，但她说，每个人只能裹着单薄、肮脏的破布，用草绳扎在一起。浮肿病让一些人看上去还健康，脸肿得很大，手臂和腿都鼓胀着。但其他人都瘦得像骷髅一样。有时，她看到，亲戚邻居在村里走路时，倒地而亡，无声无息。早晨醒来，她发现有些亲人已死在炕上。死去的人就放在原地，她说，因为没有人有力气去埋他们。

“她还记得，那时候，周围异常寂静。村子里的牛死了，狗被人吃了，鸡和鸭早已被没收充当公粮了。树上没有鸟，树叶树皮已被剥光。夜里，不再有老鼠的窸窣声，老鼠或被人吃了，或已饿死。有时，运气好的村民会在鼠洞里找到死老鼠，如果能发现一个跨季的洞穴，里面贮藏有动物过冬的粮果，那就会让人喜出望外。她最思念的是婴儿的啼哭声，村里已很长时间没有人生小孩了。最小的孩子们都已死去，女孩最先消亡。刘本人失去一个女儿。当时，她的乳房干涸无奶，不得不看着孩子死去。她的母亲、姨妈（也可能是姑妈——译者注）、两个兄弟都已死掉了。

“村庄里现在还有一些土屋，村子周边围着竹子和树木，富裕的村民正在盖带院子的砖墙瓦房。三十六年前，村里所有的人都住在土坯草房中，每处房子隔成两三间屋子。刘记得，1960年2月，大多数草房已无人居住。屋顶塌陷，院子里荒草丛生。门窗上的木头早被拿走，门框窗框也多不见了，全投入炼钢炉中了。夜里，家里人一起睡在本可从下面

烧的炕上。但在那个冬天，没有棉被盖，他们都要冻僵了。最好的被子都交给公社了，在许多家庭，最后几缕棉花已被吃掉了。炕灶里没有火，干部禁止农民在家做饭，家里不许生火。铁锅、平底锅都被搜走、熔化炼钢了。有时候，农民们用泥罐试着烧汤，或烤草饼子，但常常被抓住，挨一顿毒打。村子里只有一处地方可以冒烟。那就是两年前公社成立时，建起的公共食堂。食堂设在王家的房子里。王家过去是村里最富的一户，但公社成立前，他家的地就被分了，人被处决了。在墙上，干部们刷写了大标语：“人民公社万岁”。

“刘说，食堂是公社最可怕的一面。秋粮从农民手里收走，上缴给国家。现在，食堂是食物的唯一来源。一天两顿，上午11点、下午4点，食堂的师傅就会敲击挂在绳子上的铁块，村民们端碗排队来打他们的那份粥汤。粥汤很稀，里面有红薯叶、萝卜缨、玉米芯磨的粉、野菜及农民能够采集到的其它东西。排队打汤的时候，有时村民会打架，年轻的、强壮的会把年纪大的推搡到边上。最先到的可能除了水以外什么也领不到，晚来的则可能发现什么都没剩下。刘记得，有一次，一个干部努力维持秩序，狠狠地打了一个妇女一拳，这个女人倒下了，再也没能起来。当时，在食堂里干活的人，幸存得时间最长，村里的书记一家境况最好。他能够在夜里偷些吃的回家，尽管偷的只是干豌豆粉，已足以让刘和她嫂子（或弟媳妇——译者注）活了下来。

“刘说，最先死去的是被打成富农的家人，他们的粮食定量最低。然后是那些太虚弱、不能出工的人，不给他们东西吃。那时候，一家人会把领到的食物集中起来，通常丈夫会决定让女孩子们先去死，因为就算她们活下来，以后也是嫁到别人家去。她们的食物让给老人。接着，老人也开始死去。村民们会把尸体藏在茅屋里，这样他们就能多领一份饭。村里有些人把粮食埋在地下藏起来。刘清楚地记得，经常有人来搜查藏粮。一队队的干部搜寻秘密粮窖，他们绕着草房，拿着铁棍，捅屋顶，插土墙，挖地皮。他们搜查院子的角角落落、粪堆、草堆，一定要找到他们所说的农民藏起来的粮食。其实到了那个时候，农民家里已没有任何粮食了。但几个月前，就在收获以前，村民们在夜里从地里收了一些粮食。在收获季节，收工前，干部们对农民搜身，殴打偷吃麦粒被抓住的人。刘在田里干活，

嚼食麦粒被人发现，她被逼着吐出来。尽管她没有受到严厉的处罚，其他人就没有她那么幸运了。一个男人双手被绑在身后，吊在一颗树上。一个富农的遗孀连同她的孩子们，被一起活埋。还有一些人，头发被拽着，在村子里示众，其他村民则被命令踢打他们。

“刘还知道，在夜里，她的一些邻居到野外割死人肉吃。她指着邻村，隔着田野的另外一片草房，那儿曾有一个妇女杀了自己的婴儿，和丈夫一起把孩子吃了。后来，这个女人疯掉了，秘密也随之泄露出来。刘说，那个冬天，人变成了狼。据传，村里一些外出逃荒的人被杀害、被人吃掉。太虚弱了，走不多远，逃荒的人往往是突然倒地、死在路上。有些逃出去的人被民兵抓住。民兵带着红袖标，拿着棍子、刀，奉命在主要干道上巡逻。刘认为，那些外逃被抓的，关进监狱并死在那里了。刘听说，其它地方，有村支书带领村民抢公社粮仓的，被民兵用枪射杀。

“当村民极度虚弱无力下田干活时，干部们过来打他们，逼他们出去寻找食物。整个冬季，他们不得不参加各种政治集会、接受工作定量的指示。还有卫生检查，刘记得，想让她家的草房保持清洁是多么的困难。由于吃了不少稀奇古怪的东西，许多村民闹腹泻、呕吐。还有一些人得了便秘，不得不用手从肛门里掏出大便。有几个人，把野草和土混在一起吃，结果凝结在肚肠里，死掉了。

“所有这一切，刘记得最清楚的是，最后士兵们坐着卡车过来，把成袋的面粉扔在路上。她用尽力气走了20里路，找到粮食就在路上生吃。饥荒开始时，她们村有300人，只有80人活了下来。刘仍然相信是毛主席派部队救了他们，不然的话，所有人都会死掉。”<sup>1</sup>

《光山县志》记载，1959年、1960年全县的死亡人数分别为40768人，99378人，而在平常的年份，这一数字大都保持在4000人左右。1960年光山县的死亡率高达270.6%<sup>2</sup>。

贝克在序言的最后写到，《饿鬼》这本书讲述的故事，不单发生在光山县这个小村里，同样的悲剧当时在中国许许多多、百万个村庄里上演。

---

<sup>1</sup> Jasper Becker-贝克: *Hungry Ghosts-Mao's Secret Famine*, 第1-5页, Henry Holt & Company, LLC, New York, 1996。

<sup>2</sup> 《人物周刊》总第299期, 第38-39页。

贝克没有提到刘小花住在光山县哪个村庄；刘如果还在世，今年应该 86 岁了。《饿鬼》这本书，因作者对于书中若干资料来源的标注不够清楚，为学界所诟病，但其对于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研究的贡献是突破性的，也是非常有分量的。基辛格的近作，2011 年出版的《论中国》，其中有关六十年代大饥荒所引用的素材，基本都出自《饿鬼》，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的相关论述也引用了贝克的数字。

光山属信阳，是著名信阳事件的发生地。毛等中共最高领导人，正是因为信阳事件的揭露，才基本掌握大饥荒蔓延全国的严重情况。李富春在 1960 年 10 月，把信阳发生大规模饥荒的报告交给毛以后，中共才开始调整农村政策。贝克去光山采访也算去对地方了。

对于六〇年前后这段苦日子，官方以前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八十年代后，又含糊地改称“三年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这六个字究竟表述了什么含义呢？我们仔细领会一下：

- 首先，它指的是一种自然现象，从中看不到人的因素；
- 其次，它给后人以心理暗示，灾害可能引发灾祸，但从中看不出灾祸的程度；
- 三年，是时间跨度，经历的人都知道，那是“整个中国都在极度饥饿中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sup>1</sup>，对于后人而言，就是一个数字，波澜不惊。

几乎每个中国人，在说起那个苦难的年月时，都会很自然地提起这六个字。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在这平铺直叙的六个字里面，隐藏了二十世纪最大的灾难<sup>2</sup>；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这轻描淡写的六个字，就把中国历史上最悲惨、最难熬、最沉重的几页轻轻翻过；我们更没有领会到，这平淡无奇的六个字，就把当政者的臆想轻狂胡作非为，以及饥荒发生期间的无所作为奇妙地悄悄地推卸了、化解了、遮掩了。呜呼，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是多么神奇的六个字！

然而，正是这六个字，却可以立即唤起无数中国人不寒而栗、撕心裂肺、苦不堪言的

<sup>1</sup> 阎年科：《我与父辈》，第 83 页，出版社等暂不明。

<sup>2</sup> 贝克：Hungry Ghosts-Mao's Secret Famine, 第 273 页，Henry Holt & Company, LLC, New York, 1996。贝克认为中国的三年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

一段集体记忆！国家记忆和民间记忆在这个事件上的巨大反差。下面，让我们来揭示其后深藏的惨况，剖析其中迷离的情节。时间的流逝，或许钝化了亲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的记忆，历史的虚无和当政者的混淆视听，以及灾祸的极度惨烈，常常使后人怀疑事件的真实性，很多人问：如此惨剧真的发生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年轻的共和国当真饿死了几千万人？

## 第一章 三年大饥荒

“苍天不平 长歌当哭”。<sup>1</sup>

有学者认为，饥荒从1958年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62年。<sup>2</sup> 其实，中共建政后大跃进前，广西等地就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1962年以后，直至七十年代，多数中国人还在挨饿。但是，波及全国、最为严重的饥荒，就发生在1959—1961年，史称“三年大饥荒”。

### 1. 发生在定远凤阳和嘉山的三个真实故事

#### ● 定远九梓安哥的故事：弟弟是1959年饿死的

2014年6月，我在家乡见到了安哥。安哥是定远九梓上陈村人，1954年腊月13日出生。国字脸，中等身材，很壮实，没有什么文化，但能写出他母亲的姓——雍。虽然口音较重，但他的话我基本能听懂。安哥告诉我他的父母都属狗，弟弟在1959年阴历三月就饿死了。父亲外流，1960年死在九江，死不见尸。母亲在外地挑芋头干子，饥寒交迫，累死在定远永康魏家拐子一个烟炕，舅舅后来去找到母亲的尸体，就地掩埋了。安哥变成孤儿，被收容到几个生产队合办的幼儿园里，依然挨饿，饿得脱肛，用鞋底托着。幼儿园里几乎每天都有小孩死掉，路边常常见到死人。安哥反复地说他吃过死人肉，是在家族的一个小奶奶家吃的，说人肉酸，吃过没劲。安哥还记得，1959年时上陈村的队长好像叫张家红。

<sup>1</sup> 余习广编：《大饥荒-苦日子 上书集》，第18页。出版社等暂不明。

<sup>2</sup> 冯克：Mao's Great Famine-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Walker & Company, New York, 2011。

我问安哥，这些事情以前有人问过你吗？回答：从来没有。父母亲饥荒年月饿死他乡，孤魂野鬼至今没有还乡。每年清明，只能去魏家拐子烟炕附近（烟炕早已拆除了），给母亲烧几沓纸；只能在家乡某个路口，据说是父亲干活歇脚的地方，凭吊缅怀先父。童年的凄惨历历在目，但安哥絮絮叨叨的话语中已经没有了悲戚。他话说得很急很快，虽然他擦过眼角，但昏黄的灯光下，我没有看到眼泪。

2014年9月，我和安哥一起去九梓上陈村，看望安哥的一位远房叔爷。华叔生于1941年，70多岁了，依然下地干活，直接从地里过来见我们。华叔16岁结婚，18岁就有孩子了，当时和母亲弟弟一起住，五九年尚能过，田里有菜、萝卜，六〇年春天彻底断顿，家里饿死四口人。华叔也讲述了安哥家的事，安哥的奶奶和大妈都是饿死的。他还提供了安哥母亲死去时的一些细节，安哥父母和舅舅的名字，他都记得很清楚。华叔还说，安哥弟弟饿死的时候，太小，还没起名字。华叔告诉我，东上村和西上村，当时有170多人，后来仅幸存30多人。整个上陈村，绝户的大概有十三四家，绝户比例高达30%。对于以上这两组数字，我还没有做进一步的核实。华叔说，从六二年开始，就没有什么人饿死了。

安哥家的悲剧，仅是一个缩影，是当时中国农村凄惨状况的一个真实写照。据《定远县志》记载，“1959—1961年社员吃粮极为紧张，最困难的1960年春，每人每天供应原粮0.2~0.4斤，民多以野菜、树皮等充饥，造成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村人口死亡。”<sup>1</sup>定远县总人口数，由1958年的646053人，减少到1961年的400835人，净减24万5千余人，约占1958年人口总数的37.90%。<sup>2</sup>对于如此巨幅的人口变动，《定远县志》仅有如下两句说明：“这一阶段因工作上失误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使人口锐减。”<sup>3</sup>减少的24万5千人中，我们并不清楚多少是正常死亡，多少是饿死的，多少是逃荒的。1962年，饥荒基本得到缓解，逃荒者陆续返乡，1963年，定远县总人口数为449091人。据此，我们推算，1959—1961年，定远县人口因死亡净减约20万人。丁抒在《人祸》中说，1960

<sup>1</sup> 《定远县志》，第143页，黄山书社出版发行，1995年2月第1版。

<sup>2</sup> 同上，第128页。

<sup>3</sup> 同上，第130页。

年定（远）风（阳）嘉（山）三县人口净减四十余万人，其中至少一半是饿死了。<sup>1</sup>能否据此推断，三年大饥荒期间，定远饿死了（或曰非正常死亡）约十万人呢？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问，为什么不提供安哥和华叔的全名？这些饿死人的故事，是不是无中生有、胡编乱造的？的确，如此惨况，五十年过去了，许多细节模糊不清，但安哥华叔的名字，包括安哥父母及舅舅的名字，笔者肯定了解；安哥一家饿死三口的悲惨故事，真实可靠，绝非杜撰。安哥的大堂兄，一位七十来岁的退休教师，亲手掩埋了他饿死的奶奶和母亲。但他对于笔者访问他家饥荒年月的悲惨故事，感到愤懑与不安，强烈反对我写他家的事情。我不能不写，只能隐去当事人的姓名。对于灾祸，采用忘记的手段，对于强权，采用屈从的方式，这种生存有尊严吗？顾忌今人的平安，忘却前人的苦难，这样做道德吗？但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逝者已去，活着的还要苟活下去，面对强权，委曲求全，也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只是，如此下去，作恶者不会得到惩罚，只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横行下去；受害者得不到祭奠，冤魂不散后人不安，这样的民族与国家还有希望吗？

安哥的堂兄甚至指责我别有用心，自己家的事情不说，却要祸害别人。下面，我就说说舅舅的故事。

### ● 舅舅的故事：1960年被虐致死

舅舅，名心瑄，生于1926年，嘉山津里乡人，家庭成分地主，职业商贩。2010年5月，我和表哥问起他父亲的事情。舅舅去世时，表哥只有5岁，所知甚少，相关情况都是他母亲（我的舅妈，1988年去世了）告诉他的。表哥回忆说，他的父亲不是死在家中，而是六〇年冬受虐死在石坝水库的工地上。

六〇年腊月二十几，大队书记吕某派舅舅回津里挑运补给。舅舅身材高大，做过商贩挑夫，饭量大，水库上劳役繁重，长期吃不饱，又累又饿，二十几里路，雪天路滑，中途摔裂了一口锅。回到工地，被罚磨豆腐，不准睡觉，困乏不堪，打盹时煤油灯不慎落入豆腐中。干部说舅舅存心搞破坏，让东华三队的刘某把人吊起来，吹两头灰（一种严酷的体

---

<sup>1</sup> 丁抒：《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第243页，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7年7月修订本。



罚)，可能是年后没几天，就死在工地上了。进城向外婆（表哥的奶奶）报丧的是我奶奶，舅妈正好带着表哥在城里外婆家，婆媳俩慌里慌张地赶到石坝。舅舅已被草草掩埋，外婆找人扒出被芦席卷埋的尸体，发现舅舅的鼻子嘴上都有血迹。

当时我家就在石坝，父亲说，奶奶提过，舅舅曾到家中向奶奶讨要食物。

和表哥谈话后的第三天，表哥通过我母亲给我带话，不要再提他父亲被“糟”死的那些事了，他不想惹麻烦，这是舅舅姓氏在这里被隐去的原因。

小岗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村改革的一面旗帜，大饥荒期间，人口损失惨重。饥荒末期的1961年，小岗还有很多人饿死。

### ● 小岗村的故事：严家五口都是1961年饿死的

小岗村隶属凤阳县梨园公社，位于凤阳县城东南20公里一个海拔五十米左右的丘陵岗地。在贝克《饿鬼》书中，有这样的记录：“大跃进期间，（小岗村）饿死60人，76人逃荒，只有39人和一头牛幸存下来。”<sup>1</sup>陈桂棣、春桃合著的《小岗村的故事》中，对于小岗村大饥荒期间的人口损失有如下叙述：

- 1960年前后，小岗村“有34户，176口人”，大饥荒期间“饿死69人，死绝6户，他（指严宏昌）跟着父母逃到了外地，回来才知道，小岗最后只剩下了10户、39人。”陈书中所说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字、幸存人口与贝克的记录基本相符。
- 严立华，1978年11月“包干到户”秘密会议就是在他家里开的。他的“祖父严凤轮，父亲严国恩，母亲严吴氏，两个弟弟：小心和顺心，连个大名儿都没来得及起，就都在大饥荒的1961年饿死了，现在只落下他孤寡一个人”。
- 小岗村有一口“远近都知道的‘死人塘’”，“60、61年饿死人时，当时村里的死人太多，没场子埋，也没人埋，就都扔进了那口大塘里”。<sup>2</sup>

<sup>1</sup> 贝克：Hungry Ghosts-Mao's Secret Famine,第261页，Henry Holt & Company, LLC, New York, 1996。

<sup>2</sup> 陈桂棣、春桃：《小岗村的故事》，第25-26, 37, 45页，华文出版社，2009.9。

以上是1959、1960、1961这三年间，发生在定远、嘉山、凤阳三个普通农家、两个寻常乡村的故事，遇难人有名有姓，遇难事实有据可查。诚如贝克所言，大饥荒期间发生在河南光山县那个小村庄的悲惨故事，同样也发生在安徽的定风嘉三县的农村，以及中国其它数不清的村庄里。这是一场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大灾祸！

当时，一个一个大批饿死人、因逼粮打死人的悲惨事件，在全国各地相继发生，纷沓而来，事件的密度和强度令人窒息。事件多以发生地冠名，如信阳事件、通渭问题、湄潭事件等。下面，就以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把其中影响较大的事件罗列出来，一是说明大饥荒的时间跨度基本为三年，二是说明大饥荒覆盖全国，饿死逼死的，基本都是农民。

## 2. 1959年——大饥荒的第一年

1958年大跃进，毛及中共高层踌躇满志，欲毕其功于一役，超英赶美，其实心中渴望的是赶超苏联，变成社会主义阵营中真正举足轻重的政经强国。八月初赫鲁晓夫访华时，毛按捺不住内心的得意，问赫氏，粮食多得吃不完怎么办？<sup>1</sup>数月以后，饥荒爆发，历史着实吊诡荒诞。1958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春天饿死人更多。也就是说1959年春天，大饥荒已经全面出现。<sup>2</sup>

1959年1月，山东传来农民外逃的消息，即所谓“**馆陶事件**”<sup>3</sup>：全县从1958年10月以来，仅逃往河北邯郸的就有13000人。当时馆陶多地食堂停火、半停火，社员到处逃荒，不能远出者就近捡拾冻地瓜、冻萝卜度日。生产停顿，饿死多人，惨不忍睹。

三月份，还是山东，爆发“**济宁事件**”：当时郓城县发生130余起抢粮库事件，1万多人参加，抢走19万斤粮食，巨野有1.2万人浮肿。从1958年冬到1959年春，这个地区的农民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

<sup>1</sup> 彭卓吾译：《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第28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1。

<sup>2</sup>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831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6，第七版。

<sup>3</sup>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上册，第263-264页，台北联经，2012.1。

67 万多人，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sup>1</sup>

四月初国务院上报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个省缺粮情况，随后，又送上15个省春荒情况统计，说有2517万人没饭吃。实际上，从1958年底开始，农村不断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暂时的紧急危机”，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sup>2</sup>

甘肃“**通渭问题**”：王振1959年任通渭县副县长，他说，从五九年春季就饿死人了，五九年前半年已经饿死了六千多人，一直到六〇年冬季，人还继续在死。<sup>3</sup>

广西发生“**环江事件**”：1958年9月放了亩产稻谷130434斤的卫星后，高估产导致高征购，农民口粮收刮殆尽。到1959年春，断粮农户不断增加，四五月份饿死的人越来越多。王定曾任环江县委书记，据他说，一颗卫星让环江付出了五万人命的惨重代价。<sup>4</sup>

1959年10月，山西寿阳发动“挖粮集资”运动。从发动到1960年1月被制止，历时三个月，据运动后统计，全县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49人，后称“**寿阳事件**”。<sup>5</sup>

1959年冬至1960年春，爆发贵州“**湄潭事件**”（又称“59事件”）。约五个月时间，饿死12万4千余人。<sup>6</sup>同期，还发生了宁夏“**中宁事件**”，全县死亡1801人，浮肿2605人，外逃8518人。<sup>7</sup>

各地事件接踵而至，目不暇接，每一个都凄惨无比，沉重如山。这里，除了简单的罗列以外，没有展示更多的细节，不愿陷入数字的泥沼。情节雷同，而篇幅有限。一定会有人质疑所有这些事件的真实性，我会在本书的第六章及附录中，用最大的耐心，尽最大可能，把本书所有的资料来源，详细地一一列出，力求做到有引用必注释，有据可查。唯有真实

<sup>1</sup>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450，1158-1159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6，第七版。

<sup>2</sup> 同上，第1159页。

<sup>3</sup> 沙青：《依稀大地湾——我或我们的精神现实》，第18页，刊载于《十月》1988年第5期。

<sup>4</sup>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上册，第219页，台北联经，2012.1。资料原始来源：《南方周末》1998年10月9日登载王定的文章《狂热及其灾难》。

<sup>5</sup>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577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6，第七版。

<sup>6</sup>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566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6，第七版。

<sup>7</sup> 同上，第583页。

可靠，才能确信无疑。

下面，着重介绍一下最为严重、影响最大的信阳事件。信阳饥荒始发于1959年10月，但其蔓延、展开、揭露、遮掩、调查、处理等等，均发生在1960年。因此，我把信阳事件放在1960年的小节内。

### 3. 最苦还是六〇年

#### 为什么“信阳事件”影响重大？

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河南省信阳地区因饥饿致死的农民超过100万人，约占总人口八分之一（13.2%），并开始出现人吃人现象。<sup>1</sup>这一案件直到1960年10月才彻底



揭露出来。信阳事件影响巨大，

（左：吴芝圃，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信阳事件的直接责任人，1962年4月被免职。吴承认：“我对河南人民有罪！”<sup>2</sup>）

一是伤亡惨重，骇人听闻；二是朝野震惊，可信度高，毛刘对此均有批示，周恩来、董必武、李先念、习仲勋等皆直接参与了事件的调查或处理；三是几乎可以推断，该事件迫使中共改弦易辙。毛十月底对此事件做出批示后，11月初，就发布了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十二条紧急指示的发布与贯彻，标志着人民公社的乌托邦开始破灭。

信阳事件揭开了农村大规模饿死人的黑幕。毛的第一反应是推卸罪责，说什么“坏人当家”、“民主革命不彻底”、“打着共产党的招牌的国民党实行阶级报复”。<sup>3</sup>结果，中低层官员受到严厉惩罚，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被判死缓。<sup>4</sup>当时中共已执政十年，政权牢牢地掌

<sup>1</sup>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34、1160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6，第七版；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第612页，香港中文大学，2008；贝克：Hungry Ghosts-Mao's Secret Famine,第128页，Henry Holt & Company, LLC, New York, 1996。

<sup>2</sup>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17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6，第七版。

<sup>3</sup> 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第613页，香港中文大学，2008。

<sup>4</sup> 王梦初编：《“大跃进”亲历记》，第1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

握在手中，苛暴施政导致饿殍遍野。毛不罪己却让一批愚忠残暴小吏做了替罪羊，其狡诈无赖的丑恶嘴脸令人作呕。后来，可能是中共高层也觉得无法自圆其说，又编出个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说辞。



（左：顾准，1915年7月1日-1972年12月3日，中国当代思想家、经济学家。李慎之对他做了这样的评价：“‘只因为他的思想变成了铅字’，他给整个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挽回了荣誉。”<sup>1)</sup>

曾任新华社记者、《炎黄春秋》副社长的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一书中，开篇就浓墨重彩地写了信阳事件，其中，有很多细节，很多地名人名，引用了很多内部文件。被吴敬琏称为“老师和挚友”的顾准，1959年10月至1960年1月写下《商城日记》，商城属信阳。日记是第一手资料，顾准记录的死亡，既有身边一起劳动的队员，也有路边无名的倒尸，还有许多是有名有姓的身边人的家属，可查证性强。顾准对于饥荒诱因有超前而深刻的思考，带着学者的时代责任感，他“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来者一个经验教训”。<sup>2</sup>弥足珍贵。

除信阳事件外，1960年1—8月，广东发生“罗定事件”。罗定县一半左右的公社发生浮肿、瘦弱死人的情况，死亡达17000余人。六〇年春，贵州遵义农民成批饿死，是为“遵义事件”。<sup>5</sup>同年6月，贵州江口县饥饿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中有公社书记，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虚报产量引发民变的县委书记投河自杀。<sup>6</sup>张一弓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写到大队支书李铜钟，愧对乡亲，无计可施，只能铤而走（上：杨继绳，《墓碑》作者）险，冒死从国家粮站“借”粮。随后，在李的感召下，县委田书记命令全县二十几个粮仓一齐

<sup>1</sup> 顾准：《顾准日记》，序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sup>2</sup> 顾准：《顾准日记》，第104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sup>5</sup>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161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6，第七版。

<sup>6</sup> 同上，P1162。

打开，赈济断粮多日的社员。数日后，李因过度饥饿和劳累而死，田被撤职查办。<sup>1</sup>

民间记忆中，六〇年格外难熬。这一年春天青黄不接之际，各地农民大量饿死，是大饥荒期间饿死人最多的时候，同时，饥荒由乡村蔓延至城市，粮食危机全面爆发。周恩来从



六〇年六月到六二年九月密切关注粮食供应。

与粮食部官员会谈 115 次，平均每周一次，周还亲手制作了“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sup>2</sup>六〇年夏，全国大搞代食品；八月份，中共先开始对北京高干高知进行副食品特供；然后在九月份，向各省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

指示》；（上：刘少奇在广东从化采摘野菜）<sup>3</sup>1月召开了全国代食品会议。<sup>4</sup>到12月，北京、天津、上海、沈阳等主要城市的存粮只够几天的供应，当时每人每月仅有二两食用油。<sup>5</sup>

#### 4. 1961年——饥荒的第三年

中国步履蹒跚地进入了1961年，粮食形势并无好转，全国粮食产量为2950亿斤，仅比1960年增长2.79%。人口继续呈现负增长：中国人口总数1959年为6.72亿人，1960年锐减一千万，降至6.62亿人，1961年比1960又减少了三百多万人。需要指出，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全国人口总数除了这几年以外，均为正增长。

表格 1-1：《中国人口总数 1949-2012》<sup>6</sup>

年 份	总 人 口 (年末)	年 份	总 人 口 (年末)	年 份	总 人 口 (年末)	年 份	总 人 口 (年末)

<sup>1</sup> 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第 20-36 页，刊载于《麦秸垛》，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4。

<sup>2</sup> 麦克法夸尔：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3, 第 23-30 页，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sup>3</sup> 贝克：Hungry Ghosts-Mao's Secret Famine, 插图集，Henry Holt & Company, LLC, New York, 1996.

<sup>4</sup> 林蕴晖、丛进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第 188, 190, 194 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8。

<sup>5</sup> 麦克法夸尔：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3, 第 23 页，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sup>6</sup> 《2013 中国统计年鉴》、《2002 中国统计年鉴》（摘自网络，尚未核实）。

1949	54167	1965	72538	1981	100072	1997	123626
1950	55196	1966	74542	1982	101654	1998	124761
1951	56300	1967	76368	1983	103008	1999	125786
1952	57482	1968	78534	1984	104357	2000	126743
1953	58796	1969	80671	1985	105851	2001	127627
1954	60266	1970	82992	1986	107507	2002	128453
1955	61465	1971	85229	1987	109300	2003	129227
1956	62828	1972	87177	1988	111026	2004	129988
1957	64653	1973	89211	1989	112704	2005	130756
1958	65994	1974	90859	1990	114333	2006	131448
1959	67207	1975	92420	1991	115823	2007	132129
1960	66207	1976	93717	1992	117171	2008	132802
1961	65859	1977	94974	1993	118517	2009	133450
1962	67295	1978	96259	1994	119850	2010	134091
1963	69172	1979	97542	1995	121121	2011	134735
1964	70499	1980	98705	1996	122389	2012	135404

年初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宣告大跃进结束，实行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然而，饥荒蔓延，专制政府却不愿面对，反应缓慢。笔者至今没有搞清楚，为了应对如此规模的大饥荒，为了救济数千万奄奄一息的饥饿农民，中央政府当时是否成立了专门的赈灾机构？究竟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救荒措施？光山农民刘小花挣扎着走了二十里地，在大路边，捡到士兵从卡车上丢下的面粉，生吃而活了下来，政府就是这样救济灾民的？连个粥棚都没有？

那一年，毛还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则拖延时日，不愿轻易改变农村政策、公开承认饥荒的存在。法国前总统密特朗，1961年初曾在中国旅行三周，并得到了毛的接见，

毛对密特朗说：“中国人民根本没有接近饥荒……，为了让你们听得更清楚，我重复一遍，中国现在没有饥荒。”<sup>1</sup> 如此公然否认，自然就无法义无反顾地救济饥民。

断断续续、祸害农民约两年的公共食堂，拖至五六月份才正式宣告消亡。饥荒继续绵延，农民依然大批饿死，凤阳小岗村严立华一家五口都是1961年饿死的。城市居民也饥肠辘辘度日如年。重庆人虹影，在《饥饿的女儿》一书中说，“从我的生日推算，母亲怀上我时，是1961年的冬天，是三年大饥荒最后一个暗淡的冬天。仅仅我们这个四川省……就饿死了七百万人，全国饿死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四川人……”<sup>2</sup> 必须指出，这本书虽为自传体，毕竟是小说。有关饥荒的内容，史料价值不高，与下节中廖伯康的回忆，不可相提并论。

面对哀鸿遍野，毛依然说中国没有饥荒，密特朗相信了。

## 5. 灾难确曾发生

首先，我们注意到，若干中共高级官员在不同场合，直接或间接地承认了三年大饥荒的存在。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写到：

“1959年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在这两年中，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sup>3</sup>

在阅读薄书以前，没有指望薄会如此直白地写到大饥荒。他实际上公开承认，仅在1960年，就“因饥馑死亡”至少饿死了1000多万人。薄说“愧对百姓”，表示“永志不忘”。

<sup>1</sup> 贝克：Hungry Ghosts-Mao's Secret Famine,第293页，Henry Holt & Company, LLC, New York, 1996。此段讲话转摘自1961年2月23日出版的法文刊物L'Express。

<sup>2</sup> 虹影：《饥饿的女儿》，第3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

<sup>3</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1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



菲利普·肖特在他的《毛泽东传》中提到，1980年，胡耀邦公开承认饥荒的存在，确定死亡数目为2000万人。<sup>1</sup> 需要说明，笔者目前尚未弄清胡是在什么场合说这些话的。

廖伯康，作家虹影的同乡，曾任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1960年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1962年6月，廖在北京参加团中央会议时，经胡耀邦安排，于当月28日，在中南海中共中央书记处，向杨尚昆汇报了有关四川大饥荒饿死人的情况。廖明确指出，四川饿死了一千万人，杨尚昆当时也认同这个数字。<sup>2</sup> 《杨尚昆日记》对于1962年6月28日的活动有如下记载：“下午约重庆青年团二同志来谈话，谈农村工作问题，由三时到六时半。”<sup>3</sup>

曾任深圳市长、文化部副部长的于幼军，2011年发表专著《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在书中，于写到，“令人痛苦锥心、不堪回首的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出现大饥荒，全国上千万人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而饿死、病死，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人食人’的惨况。”“这三年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数据，无论是一千万、一千五百万、两千多万还是三千多万，哪一个数据都沉重如大山，压得有良知的中国人透不过气来！”<sup>4</sup>

我们再来说说国内外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国内外一批人口学家、统计学家、历史学家通过对于中国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研究，得出了1959—1961三年间中国人口变动异常的结论。这三次人口普查的时间分别为：1953年，1964年和1982年。1982年除了人口普查以外，国家计生委还做了生育率的抽样调查，抽查的样本超过100万个家庭，生育率抽样调查的结果发表在《人口经济学》专刊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在1954年仅公布了人口总数。中国于1964年进行了人口普查这个事实，若干年后才为外界所知，同样，当时没有公布普查结果的细节。然而，1983年，一普和二普最为重要的人口信息——按性别及不同年龄组统计出的人口数得到发表。国家统计局还出版了《1983年统计年鉴》，其中

<sup>1</sup> Philip Short, 全小秋等译：《毛泽东传》，第40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sup>2</sup>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1卷，第123-12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04。

<sup>3</sup> 丁东、谢泳：《文化十日谈》，第85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10，第一版。

<sup>4</sup> 于幼军：《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第41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4。

有几百个表格，包括1950年以来历年的人口出生和死亡率。<sup>1</sup>

贝克在《饿鬼》的前言中说，“有关中国1958—1962年的大饥荒，最不同寻常的一件事情是，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人能够确认这场饥荒是否发生过。无论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干了什么，外界广泛认为他们至少养活了他们庞大的人口，在中国结束了仿佛是年复一年的饥馑。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美国的人口学家能够研究中国的人口统计资料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惊人的：至少有3000万人被饿死，远远超过所有人的想象，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最激进的批评者。”<sup>2</sup>

贝克是记者，有时危言耸听，夸大其词。美国人口学家得出的数字，有的并不到3000万。曾任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依据上述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重新估算历年出生率，然后，再根据推算出来的历年出生人数，减去实际存活人口，重新估算了死亡率。科尔得出如下结论：“根据官方公布的死亡率计算出来的死亡人数，1957年是590万人，1964年是802万人。如果这些年（1958—1963年）的死亡人数呈线性趋势，1958—1963年死亡总人数应该为4180万人。根据官方公布的死亡率计算出来的数字是5740万人；按此算法，危机导致的人口过量死亡约为1600万人。把低报死亡的因素考虑在内，死亡人数1957年为1004万人，1964年为940万人。按线性趋势计算，1958—1963年调整后的死亡人数应该为5940万人。实际死亡总数（对估算低报进行调整）为8620万人，高于线性趋势的过量死亡约为2700万人。”<sup>3</sup>

请注意：科尔在这里使用的术语是“过量死亡”（excess deaths），既没有说“饿死”，也没有说“非正常死亡”，这充分显示了他治学态度的严谨。科尔是人口学家，他分析研究的是人口普查数据，得出的结论是人口死亡数字出现异常。但他并不知道或没有研究造成异常的原因，因而，没有把过量死亡归结为“饿死”或“非正常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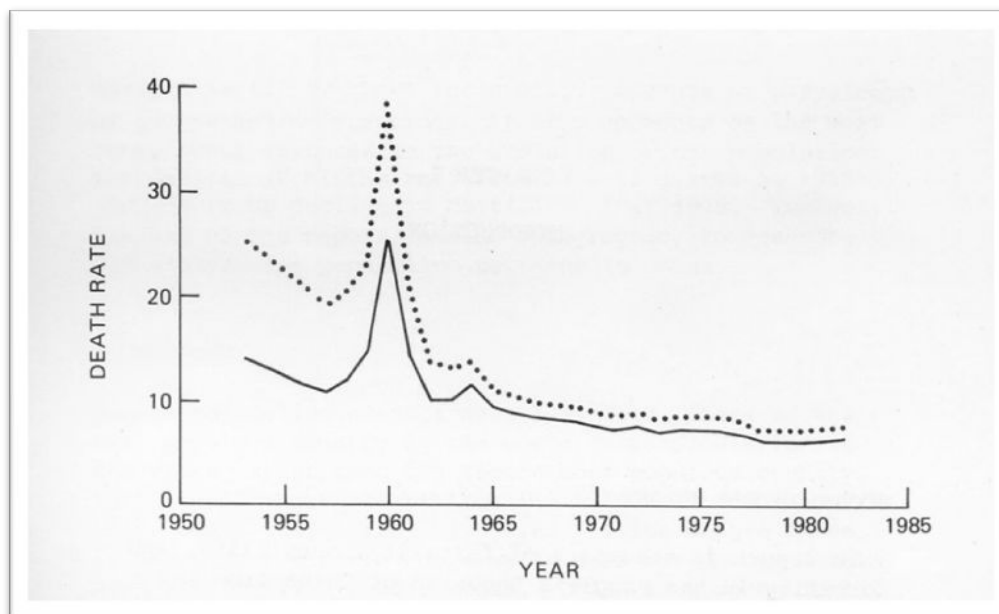
图表1-2：中国的人口死亡率1953-1982，实线为公布数字，虚线为科尔调整后的数字

<sup>1</sup>科尔：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第12-13页，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n, D.C., 1984。

<sup>2</sup> 贝克：Hungry Ghosts-Mao's Secret Famine, 第xi页，Henry Holt & Company, LLC, New York, 1996。

<sup>3</sup> 科尔：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第69-70页，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n, D.C., 1984。

(P7)



统计学家李成瑞，曾任国务院第三次人口普查办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1985年向国家计生委建议，把中国大饥荒时期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列为国家研究课题。不久，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人口学家蒋正华得到了这个课题。蒋得出的结论是，1958—1963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700万人。<sup>1</sup>虽然推算过程不同，蒋的数字与科尔根据官方公布的人口死亡率估算出来的数字，基本接近。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基本都是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为了避免陷于数字的海洋之中，再简要介绍林蕴晖先生的相关论述：对于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林概括出1-2-3-4（以千万为单位）四种说法。<sup>2</sup>国内外学者对于饥荒期间，中国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这个基本事实，是没有异议的，灾难确曾发生，分歧在于灾难的烈度及诱因。

数字是枯燥的，研究是冷漠的，一场大众的灾难仅变成了一群小众的专题，象牙塔里的成果对于中国似乎产生不了丝毫的影响。本书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力求改变这种状况，努力把这些研究成果，以普通民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形象地展示出来。让民众清楚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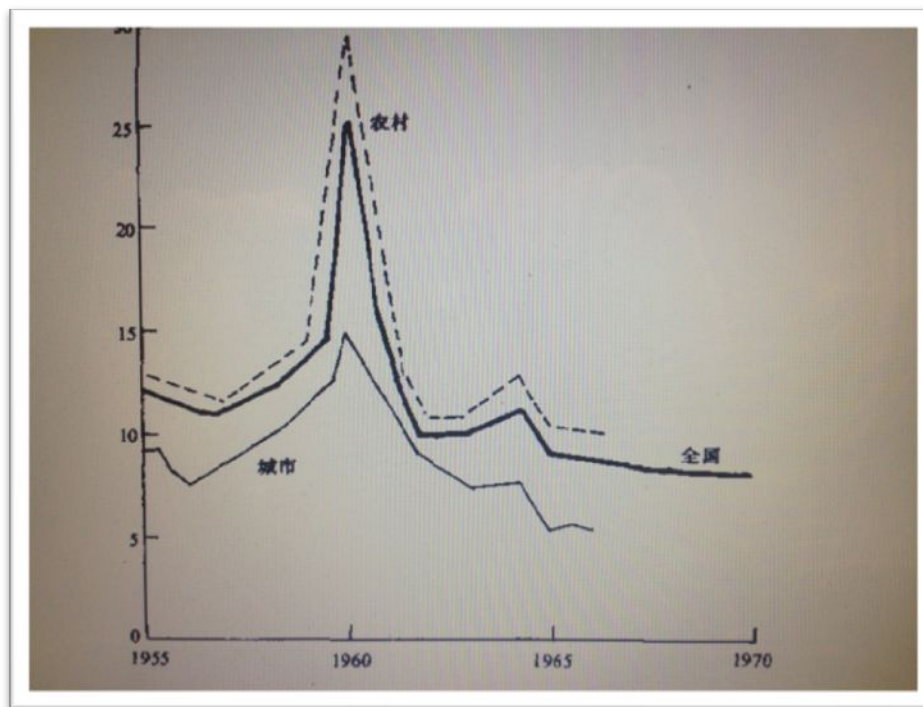
<sup>1</sup>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989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6，第七版。

<sup>2</sup>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第619-624页，香港中文大学，2008。

了解，上世纪中叶，中国的确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饥荒的过程及后果都十分严重。

法国学者西尔维-布吕内尔在《饥荒与政治》中，是这样定义饥荒的：“饥荒是指一些群体的整体食物供应的绝对断裂，并在短期内造成死亡，而无任何措施终止食物缺乏的局面。”<sup>1</sup> 1959—1961年发生在中国的大饥荒，相对于城市人口，就是对于农村人口这个庞大群体的整体食物供应的绝对断裂，许多食堂停伙了，短期内造成农民大量死亡，而且，当时没有立即采取措施终止食物缺乏的局面。从下图可以看到，在饥荒死亡高峰的1960年，农村人口死亡率为城市的一倍。

图表 1-3：中国 1955-1965 年全国及城乡人口死亡率<sup>2</sup>



所谓“食物供应的绝对断裂”，直白地说，就是断粮。为了更进一步论证饥荒的发生，再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粮食进口的异动，这个独特的角度，实证地看看粮食供应的情况，从而弄清当时中国的粮食危机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粮食进口数字来源可靠，可从国

<sup>1</sup>布吕内尔：《饥荒与政治》，第4页，王吉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

<sup>2</sup>凯恩：《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对人口和社会的影响》，第107页，毕健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2。

内外不同渠道予以核实。

## 6. 从粮食进口的异动看中国的粮食危机

### 陈云亲临塘沽接运粮食。

1960年12月底，周恩来访问缅甸前夕，同意进口150万吨粮食。随后，飞机到昆明时，周了解到进口要增加到250万吨，立即致电陈云询问。陈云说，粮食形势非常严峻，必须进口更多的粮食。<sup>1</sup> 1961年2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到达天津港。2月7日到11日，陈云一直在塘沽港口，亲自考察粮食卸船、接运情况。<sup>2</sup> 如火烧眉毛一般的粮食危机，其严重程度由此可略见一斑。

1961年第一季度，进口粮共到50万吨，二季度，又到了165万吨。第一批进口粮被立即发往有断粮危险的地区：北京、上海、天津、辽宁，还有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1961年，粮食进口高达580.97万吨，是共和国成立以来11年粮食进口总和的六倍。其中，小麦进口388.17万吨，约为1961年中国小麦总产量的27%。

表格 1-4：中国粮食产量及粮食进出口数字：1959-1966（单位：百万公吨）<sup>3</sup>

	粮食总产			小麦	
	产量	进口	出口	产量	进口
1959	170.0	0.002	4.15	22.18	0.00
1960	143.5	0.06	2.72	22.17	0.04
1961	147.5	5.80	1.35	14.25	3.88
1962	160.0	4.92	1.03	16.67	3.53
1963	170.0	5.95	1.49	18.48	5.58
1964	187.5	6.57	1.82	20.84	5.36

<sup>1</sup> 麦克法夸尔：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3, 第23页，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sup>2</sup> 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第718页，香港中文大学，2008。

<sup>3</sup> 麦克法夸尔：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3, 第28页，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965	194.5	6.40	2.41	25.22	6.07
1966	214.0	6.43	2.88	25.28	6.21

到1960年底，外界已清楚了解中国决定寻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谷仓的帮助。1960年12月，澳大利亚小麦事务局宣布对华销售24万吨小麦，随后又增加了6万吨。<sup>1</sup>1961年2月初，加拿大农业部长宣布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将向中国发运75万吨小麦、26万吨大麦。1961—1964年，粮食进口用去了中国所支出硬通货的一半以上。<sup>2</sup>贝克说“1961年初，中国政府改口，开始承认粮食严重匮乏。……台湾的国民党说他们随时可以提供10万吨粮食。”<sup>3</sup>这个英国记者很能爆料，就是缺乏注释。几乎同时，日本外相悄悄送话给陈毅，愿意私下赠送中国10万吨小麦，被断然拒绝了。<sup>4</sup>连赫鲁晓夫也说可以借粮给中国，这一事件我们在第三章再详细介绍。

无论如何，由此可以推断，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人口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是因为粮食严重短缺。中国大饥荒发生的事实，断粮导致农民大量死亡，言之凿凿，不容置疑了。

为什么粮食会如此严重地匮乏呢？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吗？■

<sup>1</sup>同上，第24-25页。

<sup>2</sup>凯恩：《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对人口和社会的影响》，第70页，毕健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2。

<sup>3</sup>贝克：Hungry Ghosts-Mao's Secret Famine,第296页，Henry Holt & Company, LLC, New York, 1996。

<sup>4</sup>冯克：Mao's Great Famine-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第115页，Walker & Company, New York, 2011。

【评论】

## 读刘朝驹的《文革史话》

杜钧福

天津作者刘朝驹先生下了大功夫，写作了一部巨著《文革史话》，在网上发表。据说总字数约700万字，1390回，27卷，七部。现在网上已经发表了1000回以上，还纸本出版了第一部《山雨欲来》，分上下两集，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这个第一部有101回，时间范围从1964年底到1966年7月底。

如书名所示，这部书是史话，也就是通俗历史读物、章回体。但是，和一般所见文革通俗读物不同，该书取材相当严格，一般都言之有据，所以，又可以认作是非常丰富的文革材料汇编。

但是，将原始文革材料简单汇集在一起讲不成故事，为连缀成裘，必须杜撰一些情节或对话把素材联系起来。这要看作者的功夫，也要看作者想写一本什么样的书。这位作者所做的，是尽量少引入新的信息。

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如果有了一连串实验数据点，必须把它们大致连缀起来成曲线，才能找到规律性的东西。在连接数据点的时候，总要有一些假设，一般多采取“最大熵法”，即尽量少的引入新的信息，取最大可能的路径进行。我看刘先生就是这样做的。这里主要指的是已出版的第一部。我看现在网上发表的部分，虚拟之处越来越少了，基本上是原始材料的集成。

这样做的结果，尊重了历史事实，但舍弃了可读性。如果把它当作《三国演义》、《说唐》一类的历史小说来读，未免失望。虽然这段历史的精彩之处不亚于中国历史任何时期。

可读性差还在于，作者是严格按时间顺序叙事的。叙事单元一般是几天里发生的事。刚说完湖北的事，又跳到四川，前因后果不可能交待很清楚，不利于叙述持续时间较长的

事件。

至于客观性问题，在引言中，可以看到作者还是有自己的立场的，但是叙事还是尽量做到客观。只是由于取材的关系，必然将原来素材的倾向性带到书中。例如1968年河北的磁县事件，迄今只见单方面的描述，不可避免有片面性。但是不同来源材料的倾向性不同，总体上还是比较客观的。

还有些地方可能受坊间的传闻影响，如21回谈到1965年12月彭真到上海，当面批评张春桥“你们发表姚文元文章也不打招呼？党性到哪里去了？”这是1966年3月，彭真在北京要许立群转达的话。当时形势和年前完全不同。在1965年12月的上海，彭真完全不可能当面对张春桥说这些话。

尽管有这些缺点，我估计，读这本书的人，作为消遣的远少于做研究的。原因在于所搜罗的材料空前丰富，是我所见关于文革的书籍、大事记所远远不能比拟的。而在当前的文革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还是弄清史实。

问题在于，因为形式上不是学术著作，未标明引文，当然也没给出出处，作为学术研究工具有缺陷。我建议作者在全书完成以后，不妨做一个人名和地区部门索引，将很有利于研究者。

既然没注明引文也没出处，有什么用呢？还是有用的，至少可以作为大事记使用，而且是很详细的大事记，大事小事都有。

我确信，日后文革史必将成为显学。届时可能有人对此书进行疏证，也可能有人根据书中的材料编一部真正的历史演义。■



【评论】

##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时期的萧军日记

袁洪权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并加了“按语”。这些“按语”直接由毛泽东起草，说明胡风的文艺思想在中共高层中的反映程度非常强烈。

五月十七日凌晨，胡风在家中由刘白羽带路来的公安部执行人员从家中带走。所以，《胡风全集》中收录的日记，到五月十五日止，十六日没有来得及记日记。《胡风全集（10）》中没有收录胡风之后的日记，胡风的家属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说明。

五月十八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对胡风的逮捕审查。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大量的编者按语，并发布《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接着，全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在五月二十六日召开扩大联席会议，通过了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撤销他担任的一切职务、并建议有关方面撤销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等决议。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生之后，全国文艺界批判胡风的文章真可谓满天飞。一九五五年的全年《文艺报》目录一查阅，我们就很清楚当时全国文艺界的“一边倒”趋势。胡风被认定为全国人民的“罪人”，其负面影响及其给胡风本人、胡风家人造成的伤害，我们可想而知。文人之间的绝交信也大量的流传开来。

不过，此时处于文坛边缘被彻底边缘化的东北现代作家萧军，却并没有赶这个“时髦”去写胡风的批判文章。七月七日，萧军收到冰夷送给他的“绝交信”，其原因就在于“自胡风事件揭露后，因我与其相识，又因我有‘东北事件’，于是群起恹恹，而我又未写文章以‘自表’，他竟来信和我绝交，恐为我所累。”<sup>1</sup>他在七月二十五日日记中，表达了自己对胡

<sup>1</sup> 《萧军日记补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95 页。

风事件的“看法”：

自从胡风事件以后，有些人劝我，应写文章表明态度，这对我有“好处”等等。我的考虑是不同的，有以下一些理由，我决定不写什么：1. 一般人全知道我和胡风认识很早（这是事实，一九三四年冬在上海，由鲁迅先生间接介绍的，那时胡风在左联工作），加上我在东北被刘芝明，东北局（高岗主持）批评过，会疑心我和胡风集团有什么连结，此时我写文，也可能有“表白自己”“掩护自己”的嫌疑，因此我决定让这事件澄清以后再说。2. 在我的“东北事件”未得到“明朗”宣布以前，我是决定任零碎文章不写的（小说例外），过去是如此，此后也如此。……<sup>1</sup>

萧军认定自己的态度，“我是决定不写什么，也许有人会怀疑我对胡风还有‘感情’，立场不明确，这也随他们去”，显得很干脆也很直率，这真符合萧军的“军人气质”。七月二十六日，萧军看到《光明日报》刊载了一则有关山东大学的“消息”，从而勾起自己对一些老友的怀念，包括胡风、聂绀弩、吕荧、方xx（萧军日记中隐去，本文遵照萧军日记的处理方式也隐去），此时吕荧和方xx就在山东大学工作。萧军在本日日记中写到：

胡风，绀弩，吕荧，方这全是我所认识的，而且历史全不短，方近乎三十年，胡近二十多年，吕也有十几年。而今天，他们全各种不同的有了“问题”，这使我不能不感到深沉的痛苦，不管从革命立场出发，从个人的友谊关系出发，全不能使我轻松。如果这些人真正堕落到“反革命”的道路上，而我和他们认识如此之久，竟不能觉察，这说明自己昏庸到何种程度；但是作为一个人，一个朋友……我确是从来没有觉察出他们有企图反对共产党，推翻人民政府这气味。不正确的言论，思想，感情，牢骚是有的，说他们要忠心蒋介石，企图让美帝国主义来统治中国，除非把确凿的“特务组织”的凭证摆在我的面前，我

---

<sup>1</sup> 《萧军日记补遗》，第496—497页。

不能相信他们会堕落到如此卑鄙的地步！<sup>1</sup>

尽管自己处在文坛的“边缘地带”，萧军还是对胡风事件进行了评估。他认为，经历此次胡风事件之后，文艺界（直白地说应该就是作家型知识分子们）可能发生三种倾向：（1）“谨小慎微，不敢负责，对于每个人全怀疑，不敢信任，对于稍稍有些突出的作品，就不敢出版，或拖延，或者改而又改，才能出版”；（2）“或者取得了这一次另一面的教训，严格纠正缺点，团结作家，明（应为“命”——笔者注）他们开展创作，使文艺界好好活跃起来”；（3）“或者一面团结，一面斗争”。<sup>2</sup>

根据他的经验和估计，他认为第一种可能性较大，“文艺界一时澄清和活跃是不可能的，至少要三两年以后”。萧军的这个估计还是比较有意思，迟至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文艺界的再度繁荣才得以实现，那被文学史称之为“百花时代的文学”。

萧军据此对自己的文坛处境表达了“看法”：（1）“对我的作品，就尽可能限制，不使它顺利，不大量出版，以免扩大我的影响”；（2）“已出版的作品，要限制印行，或不再印行。未出版的作品如《过去的年代》，短篇集等，尽可能拖延，或不再出版”；（3）“等待相当机会，或者再对我的思想和历史彻底清算一番，或者在文学上就消灭我，除非我认真‘低头’，就不甘休”。<sup>3</sup>

萧军的这种预测，果然在之后的文学出版过程中遇到。他的长篇小说《过去的年代》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迟至一九五七年六月，小说分为上下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初版印数一万三千册，定价三元五角。

在这部长篇小说出版的同时，再一次批判萧军也浮出了水面，这就是《萧军思想批判》一书的“再版”，它表明：一九四八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东北局对萧军的批判是正确的。

<sup>1</sup> 《萧军日记补遗》，第498页。

<sup>2</sup> 《萧军日记补遗》，第502—503页。

<sup>3</sup> 《萧军日记补遗》，第503页。

一九五八年三月，配合反右运动以来的作家批判运动，《文艺报》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掀起了“再批判”浪潮，其中仍旧有东北作家群中的代表性作家萧军，他再一次被与丁玲、王实味、艾青、罗烽等人捆绑在一起进行了严厉批判：“王实味、丁玲、萧军的文章，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做反共宣传的材料，在白区大量印发。萧军、罗烽等人，当时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丁玲、陈企霞等人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成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sup>1</sup>

当然，萧军在反右运动期间，虽然没有成为实实在在的“右派分子”，但他在意识形态的监控部门看来，仍旧是一个“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之后至文革期间，萧军的作品再也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一九七九年十月，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再版三十年代他与女作家萧红的合著《跋涉》，才真正解禁他的作品。■

---

<sup>1</sup> 《“文艺报”编者按语》，《再批判》，作家出版社1958年6月版，第2页。

【述 往】

##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

### 第二章 监禁和审讯

王丕忠

#### 被捕之初

我被殴打后，关入看守所监房内，昏睡了不知多少时候。夜里醒来，往四周一看，房间约二十平方米，三面是水泥墙，一面是铁栏杆，栏杆外是走廊，走廊有门通向院子。走廊中有一盏电灯，发出微弱的黄光。房间内地上横七竖八地睡满了人，没有一点空隙。我的位置是在墙角一个马桶旁，只可蜷缩，脚伸不直。房内臭气熏人，除人的汗气外还有马桶中散发出来的恶臭。我一阵恶心，睡不着了，撑起身来靠墙坐着。

我将被捕前后的一段情景在脑海中重演了一遍，心想我到底做了什么竟会发生这样的事？经过苦思终于在杂乱的回忆中找出一条头绪，这是一年多来我在局中所受到一连串迫害的发展，至此竟用诬陷的方式来置我于死地。起初我认为一个政权，尤其是在掌权之初，多少会顾到法制和人权，因而我还有可能得到法律的保护。按理逮捕和判刑总应以事实为根据，总应获得确切的证据，总要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我自问既不是特务，且与特务组织毫无牵连，除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外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一向是个不问政治的人，以为政治问题与我无关，政治性质的罪名决不会落在我的头上。可是如今，竟然把我当作政治犯，真是不可思议，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身经这种生死存亡的变故，我陷入深思而有所领悟。导致这样的情况应归咎于我的无知。这无知缘于史无前例，无所借鉴，不可能有先见之明而有所警惕。另一原因是我生性耿直，不虚伪，把自己暴露为攻击者的目标。在当时那种困境和难堪中，我还幻想要搞清自己的问题，依靠法律的公正使我脱出樊笼。

一夜乱想不能再入睡，就这样，在昏暗灯光下，臭气熏人中熬到天亮。

被捕之初，愤怒和悲哀两种不相类的情绪交替地折磨着我。可是最使我忧虑的事是双亲年迈体弱，靠我和哥哥两人微薄的收入赡养。我哥哥有家室，自顾不暇，我入狱后负担即落在他一人身上，如何能维持下去？这精神上的折磨胜过了肉体上的痛苦。

入狱后头几天没有来提审。不来提审使我很不安，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不过当时我实在没有精力去应付提审，那将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尽管身体虚弱，精力不济，但为了自救，还得尽力挣扎。

此后不知被闷关了多少天。一天下午我正昏昏欲睡，看守忽然来喊我，说是叫我去受审。我闻声跃起，兴奋之极。他带我走过院子、走廊、楼梯，来到审讯室。室内已有一名身穿中山装的干部坐着。他命我隔着一张大的办公桌坐在他对面，用敌视的眼光看着我。此时又进来两年轻人，坐在墙边一言不发，是来警戒还是来监视，不得而知。

审讯开始了，彼此一问一答地进行着。主要是追问我的出身成分，“反动经历”，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担任过什么职务，干过什么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有几个同谋等等。其中除了出身成分和“反动经历”外，其他我都无可交代。可是他决不轻信，穷诘不舍，并说政府已掌握了我的犯罪事实，就看我坦白不坦白，同时不断地用“你不老实”，“你狡猾”，“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拒不坦白，死路一条”等威胁性的话来恫吓。

我并不胆怯，甚至大声反驳，我说：

“我没干过的事叫我交代什么！政府常说要讲实事求是，为什么在严肃的法律问题上不讲实事求是？你说政府已掌握了我的材料，那你就讲吧，我如干过，决不抵赖，甘受严厉处分。”

就这样纠缠了很久，天色渐暗。旁边坐着的人开了电灯，在灯光下又过了一些时候。提审员看来一时也逼不出更多的口供，于是收拾起一叠厚厚的记录，叫人把我押回监房。同监的人已吃过晚饭，把我的一份留给我吃。我心绪烦乱，胡乱吃了几口。因为提审时间太久，他们为我担心，围拢来问我提审的情况，我疲倦已极，但不忍拂他们的好意，简单

地搪塞了几句。

那时还在“惩治反革命条例”颁布之前，大逮捕、大镇压还未开始，对我那样的桀骜不驯，总算未用体刑。当时我也没有想到体刑这一点，此后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 监禁生活

这次提审后大约有十多天没有再来提审。在这些难熬的日子里遇到了一些可怖之事。其中之一是一个在押犯夜里吞食了自己的眼镜碎片，因疼痛难忍嚎叫起来，把全监房在押犯、看守都惊醒。起初大家以为他是患了急性阑尾炎，但睡在旁边的一个人发现地上有一副眼镜，只有架没有镜片，才知道他是吞食了碎镜片自尽，于是把他抬走了。抬去何处不得而知，猜想是去医院急救。反革命犯的生命本来是没有价值的，不值得营救，但在未定案前死去，得不到口供，会对破案造成困难。

这一事件，办案人和看守是有责任的。按例在押犯在被关入监房前，须把他的眼镜、裤带、一切金属制品等，凡可作凶器或自杀之用的东西都要搜走。我是连鞋带都被取走的。在押犯中有人说吞食玻璃片自杀是最痛苦最遭罪的，因为一时死不了，可又救不活，须在肠胃被磨烂后才能死去。大家听了毛骨悚然。

第二天一早看守所所长就来训话，大意是夜里吞眼镜片自杀的那人是反革命特务，罪大恶极，自知政府放不过他，活不成，于是自杀，企图借此隐瞒他的组织和同犯。其实他的一切情况和罪行政府已了如指掌，如果他能相信政策，靠拢政府，彻底坦白交代，检举揭发，争取立功赎罪，还有获得宽大处理的可能，不一定被镇压，不必走自杀这条绝路。他是反革命罪犯的反面教材，大家从他这一事例中应得到启发教育。

我也是以“匪特”这一可怕的案由被捕的，见到此人的下场，不免兔死狐悲，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自杀的人，是否被抢救不死，不得而知。不过听看守所所长的讲话口气来猜测，他是死了。

有一天，一个外国人关进看守所来了。他能讲英语，于是便用英语和我交谈。他原来是德籍犹太人，是行医的，在希特勒掌权后曾受到迫害，坐过牢。出狱后即逃往英国，后来和一英籍犹太妇女结了婚，并入了英国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夫妇二人一起来到中国，在上海市开设了一所“万国殡仪馆”。解放后这殡仪馆由于是外资企业，勒令停业，一切财物被查封。他因私人轿车的汽油放在殡仪馆，便擅自开车进入殡仪馆去加汽油，于是被捕。

我对他说：“你的问题不严重，很快就可以解决。”

他便问我：“你是为什么事被捕的？”

“我是以反革命匪特的案由被捕的。”我告诉他。

他听了默不作声，沉寂了一会后说：“你的事不简单，性质严重，不容易解决的。近些日子外面天天有枪毙反革命分子的消息。政治迫害是毫不容情的。我就几乎死在纳粹政权之下。”

我知道他所说是可信的。因为看守所中有一份报纸，在所谓学习时间由在押犯人中指定一人读报，大家听，然后讨论，写出发言记录交所长检阅。因此知道报上确实天天有破获匪特和反革命活动的报导，而且被处决的人愈来愈多。这种消息对我的刺激很大，使我的精神处于紧张之中，交织着愤怒和恐怖。我体会到陷入这种处境，确实有性命之忧，被枪决是完全可能的。想到他是医生，有生理知识，于是问他：

“一个人被枪毙，痛苦大不大？”

“不大”，他说：“甚至本人还听不到枪声便死了。”

我对他所说的半信半疑，便接着问：“何以见得？是否经过生理上的证明？”

“枪毙一般是打头部，”他说：“痛苦的感觉是从脑神经中产生的，枪毙时子弹把脑组织破坏了，脑神经便失去作用，痛苦便无从产生。但是如果枪打不正，或打在身体别的部位，情况就不同了，就会有痛苦了。”

“那末杀头是否很痛苦？”我又问。



“杀头是有痛苦的”，他说。“但时间很短，因为一个人头被杀下后，头颅中的血液很快就流失，脑组织没有血液便不起作用，与被破坏相同。枪毙时只要子弹打中要害，死者不会抽搐，就表明没有痛苦。这是用动物作实验得出的判断。”

他是医生，当然有这方面的知识，而且所说也合乎逻辑，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和他的一席谈话，似乎没有把它写出的价值，可是事实上对我却有莫大的帮助，我由此减少了对被判死刑的恐怖。在当时处境下，心理上得到了宽慰。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极深，大大有益于我的精神状态，觉得很值得记下。

我和这医生用英语交谈，不久便被看守察觉，报告了所长。所长把我叫去，问我和那外国人谈些什么，我据实相告。他警告我说，按看守所的规则，在押犯不准许用外语交谈，并命我不许再用英语和他谈话。因为了解我和他素不相识，而且他的问题不是政治性质，并不严重，因此只叫我写了一份检讨书，自认错误，并没有给我处分。当时大逮捕大镇压还未开始，对监规的执行还不太严格，对我也就不再追究。过不多久那医生便被释放了。

久久不来提审使我非常纳闷，我盼望我的问题能早日解决，至于怎样处理，也由不得我，只有听天由命。过去一年多在工作时与党员、干部、积极分子相处中，已深知他们是怎样一种人，怎样处世行事。出于表现对共产党的忠诚，出于投机，出于伪装积极，也可能出于左倾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不顾真理，不讲人情，只讲立场和服从命令听指挥，把言论自由甚至思想自由都视为不应有甚至非法的行为，唯有以上级的意旨和指示作为行动的纲领和准则。即使有人有正义感、同情心，也就是俗话所谓的良心，也决不敢表达出来，只有深深地埋在心中。

我既然以反革命匪特罪被捕，凡认识我的人，即使是深知我的至亲好友，没有一个人敢对我表同情，敢为我辩解，否则就是站在反动立场，就会被株连，就会以同情反革命分子或包庇反革命分子论罪。沾上这种“污点”，将永无翻身之日，除非政权更迭。综合上述原因，所有党员、干部、工作人员以至积极分子都一边倒。按当时的逻辑，不倒向左便是倒向右，中间路线是不存在的。结果是没有人敢主持正义，主持公道。

何况一个政治犯罪行的行的大小，既没有公认的或公正的法律作依据，又没有一定的标准来衡量。审判人员可随心所欲地判犯人徒刑，无期以至死刑，但判无罪释放是从未听说过。审判员中没有人敢做此决定，原则甚至可说是“只能捉不能放，只能偏重不能偏轻。错捉错判，不成问题；轻放轻判，那末当事的办案人和审判人员便要以偏袒犯人或失职论罪。”这些情况是在我被监禁和判刑前后较长一段时间中，根据所见所闻而领悟到的。

在看守所中也不知过了多少天。监房中是见不到阳光的，白天阴暗，夜里昏黑，再加屋小人多，空气不流畅，关押在里面，苦不堪言。有一天忽然外面开始放鞭炮，监内人知道是过春节了。上面已提到，在被捕前不久我曾去过家乡一趟，住了几天返回上海市。临行时曾对双亲说我在春节前一定回去，一起过春节。这一诺言不能实现了。他们可能还不知道我已被捕入狱，等我不来，又无消息，一定非常着急。而且我还准备筹划些钱给他们，现在落空了。我家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景况一向不好，解放后更为困难，几至朝不保夕，断绝了接济，生活难以维持。这使我忧心如焚，没想到过去在小说里、故事里读到的凄惨情景，现在竟在我的生命中出现。

就在这些日子里，看守所中的在押犯愈来愈多，调进调出也愈来愈频繁，其中以反革命犯占绝大多数。有几个人是在办了反动党团登记以后被捕的。据说凡属国民党员、国民党外围的反动政党党员和三青团团员以及曾在反动政府任过公职的人员都要登记，交待各人的职务和反革命活动等等。只要彻底坦白，交待清楚，便可放下包袱，免于追究。可是没有去登记倒没事，一去登记便被抓进来了。罪名是“登记不诚”或“避重就轻”或“蒙混过关”等等。这时报纸上公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接着就是大逮捕，一夜之间捉了数以万计的反革命分子。捉进看守所的人因此更多，人满为患。

小小的监室几无立足之地，臭气熏人。室内仅有一个大便桶，远不够应用。早晨打起床铃后，大小便要排队等候。满了一桶后须由犯人抬出去倒了才能继续供人大小便。等候的时间太久，憋的实在难受，我有几次几乎失禁。这在名义上算不上体刑，实际上苦不堪言，难熬程度恐怕不亚于体刑。夜里睡觉时，因每人躺下所占面积更大，更是摩肩擦背，

不易容身，双腿也不能伸直，只能曲身缩作一团，大家挤在一起，情况有如猪圈。伙食初时虽粗劣还能吃得下去，后来米饭竟是夹生，又带泥沙，不堪入咽。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一天天消瘦下来，摸到身上的肋骨渐渐突起，身体感到疲乏，头感到晕眩。我天天盼望再来提审，以便早日定案，不管死活，早日脱离困境。

### 欲加之罪

就这样盼着盼着，眼看着比我后进来的人很多陆续调出，去向不明。但我却仍然不动，心中焦急。又不知挨过了多少日子，一天中午开饭后，一名看守忽然来叫我的名字，传我去受审。我听到后心直跳，并不是由于害怕，而是由于兴奋，心想这下可有变动的希望了。穷则思变真是常情。我被叫出去后，由一名公安人员押我走出监房，进入走廊，然后出一道铁门到院子中。那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因久居在昏暗中，突然走到阳光下感到刺眼。抬头一看院子里的树已发出嫩芽，枝头小鸟不断鸣啾，一片初春景象。我被捕时是春节前不久，现在想来早已开春了。

这次提审在一间像是客厅的房间中进行，大概是由于提审人次太多，审讯室和办公室已不够应用。提审人员仍是前次那人，另有记录员一人同在。二人表情严肃冷漠。提审的内容除以前追问过的事又增加几项莫名其妙的事，问我有没有和台湾通过密码无线电，说我有计划参加太湖一带国民党军队残部，一起打游击攻击解放军，进行反共反政府活动等。

他们提出这类毫无根据的问题，表面看来只觉得荒谬，其实用意中含有杀机，因为这些罪名可作为判处死刑的依据。而且用“匪特”案由逮捕和法办反革命分子可说是无往不利。家属和至亲好友听说你是匪特，只有瞠目结舌，惊恐而不敢说你不是，很可能怀疑你真是。从事特务活动的人本来就是极端保密的，即对家人也守口如瓶，不露形迹。如果扣上现行特务活动的罪名，那么处以极刑，便是“罪有应得”。在当时的局势下，这种情况决不是言过其实，更不是危言耸听。

我当时自忖在劫难逃，从而不存在侥幸心理，这样反而使我壮起胆来，侃然辩护。

我说：“你们问我和台湾通过密电没有？请问通密电要有电台，我没有电台用什么工具去和台湾通密电？我住在集体宿舍，一间房间住很多人，整天整夜还有工友看守房间，我有可能私藏电台和秘密通电吗？你们又说我要去加入国民党残余部队，在太湖一带打游击，进攻解放军。那么以前认定我要赴港投匪的罪行是否还成立？我只有一个身体，分身乏术，要去香港不可能去打游击，二者一在国内一在国外，我怎能一个人同时在两地进行活动？”

经我这样一辩驳，他们一时不能作答复，哑口无言，继而恼羞成怒，厉声说：“你是人民的死敌，我们说你想要干这，又想要干那，并不矛盾，你是什么坏事都想干。我们苦口婆心要你坦白交待，努力自救，争取宽大处理。共产党的政策一贯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现在一味狡辩，就是在抗拒，死路一条。”

这“死路一条”似乎有两种含义：其一是走向死亡；其二是此路不通。我也辨别不出是哪一含义。他们这种话听来可怕，却并不是恫吓，而是实情。我虽明知我的态度对自己不利，可是在愤怒之下失去克制，并非勇敢和无畏。双方舌战至此暂告一段落，然而提审还并未结束。关于我企图赴港投匪和收听“美国之音”、造谣等问题上，又重复和我纠缠，不厌其烦地追问细节。我一再说明我并不要去台湾，而是要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该署在亚洲的负责人以前是燕京大学经济系的美籍教授，我曾听过他的课，认识他，想通过他的关系进入该署，据知已有几名燕大毕业生在他那里工作。我又说明联合国是世界性的和平机构，不是反动组织，我想到那里工作决不能视作投敌和犯罪。而且我是为了求职谋生，更谈不上反革命活动。至于收听“美国之音”，我也认识不到有罪，政府那时还未明令禁止。关于说我造谣，我只是在谈话中偶尔提到美国电台的报导，并非我无中生有的造谣。

提审员听了我的话，按捺不住，拍案厉声说：“这样说来你一点罪也没有，是我们抓错你了。你们知识分子确实狡猾，没有理会辩出个理。就算你想逃往联合国，联合国在哪儿？不是在美国纽约吗？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作战，是我们的敌人。你想去美国不是投敌是什么？你说收听‘美国之音’不是犯罪，美国是敌国，‘美国之音’是敌台，尽播不利于我国的宣

传和谣言。你非但收听而且传播，替敌人作宣传，作他的爪牙，这种危害性你不是认识不到，而是甘心与人民为敌，想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墙角，想推翻共产党的统治。”

在当时抗美援朝的战争时期，这些话足以置我于死地。对他们来说我是死有余辜。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当然也体会到这些话的分量，同时也醒悟到为自己辩解毫无用处，反而加深冲突，加深矛盾。本来或可逃得一命，但如继续“抗拒”，不但无济于事，且有受体刑的危险。死虽不足惧，可是受刑是难堪的。想到这点，心中害怕，只有默不作声，不敢再反驳，一切听天由命。本来已是瓮中之鳖，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挣扎或抵抗都是徒劳。

这次提审进行了整个下午，从中午起一直到晚饭。提到的问题很多。提审将结束时，提审员拿起桌上的一大叠材料向我一扬说：

“你看这些都是关于你的材料。共产党人做事最讲认真。我们不惜人力物力，把你的反动经历和反革命活动调查得一清二楚，都有人证、物证、时间、地点。现在的问题不是怕你不肯坦白交待，一切材料都已掌握，你是抵赖不掉的，而是看你是否相信党，相信政府，有悔改表现，主动坦白交待，检举揭发，努力自救，争取宽大处理。”

听到这一套教条，我一阵恶心，可是不敢吭声，低头不语。提审员见我不作声，或许以为我已接受了他的意见，有了悔改之心。也可能他自己也感到疲倦，无意继续纠缠，于是对我说：“今天就到这里。你回去好好想想，作一番思想斗争，把你的所有反动经历和反革命罪行完全彻底地坦白交待，你才能放下思想包袱，争取宽大处理。好啦，就到这儿，过几天再来叫你，现在你回去吧。”

他说完后打铃叫来警卫把我带回监房。这时已是掌灯时分，院子里已经昏暗。回到监房，晚饭已经开过。同监的人代我留下了一铝盒的饭，上面有几片咸菜。我虽久未进食，可是心烦意乱，吃了几口便吃不下去，心想，盼望多日的提审，本想借以搞清我的问题，早日结案，不料节外生枝。提审中除了以前提过的几个问题，如企图去港转去联合国善后经济总署、收听“美国之音”、造谣、在何时何地同何人谈外国电台关于当时朝鲜战争的报道、在何时何地同何人讲过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言论等等之外，又出乎意外无中生有

地增多几项莫须有的罪名。用意何在，不言而喻，无非是要加重我的罪名，从严惩处。

在这种情况下，辩驳是毫无用处的。由于与我遭此同样命运的人不计其数，所以对当权者和办案人来讲，可谓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在这次提审后，看来我的问题比预料的要复杂得多，不是容易解决的，因此忧心忡忡，坐卧不安。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是我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恐怕也不是有法纪有人权的民主国家的人民所能想象的。

### 车站路看守所

那次提审以后，我仍被关入令人难熬的监房。自己感到身体日渐虚弱，摸着自己的身体感到瘦下来了，面貌有何变化，因无镜子可照，不得而知。伙食粗劣，空气污浊，室内潮湿，不见阳光。夜里睡不好觉，白天整日呆坐，无走动的余地，再加思想上的忧虑和伤感，夹杂着恐怖，在这样的处境下，健康状况不可能不恶化。就这样又不知熬过了多少个整夜，监房中的犯人调入调出更频繁了，到后来是入少出多，监房中拥挤程度有所减缓，什么原因不得而知。猜测是被捕的人数减少了，其实是因为一部分被捕的人不经由公安局看守所，而是直接送到监狱。这情况是我在转押到那里后才知道的。

在看守所中的在押反革命犯，一般只拘留一星期左右便被调走，至多也不超过半个月，而我却被扣押了将近两个月，使我越来越烦躁不安。想来是由于我的案情复杂和严重，因此心情极度恶劣，度日如年。

有一天阴雨，我正昏昏欲睡，一名看守忽来喊我：“某某某，醒醒！今天你要调走了，赶快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打好铺盖，等一下来叫你。”

“调我到哪里？” “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

他不肯告诉我要调到什么地方使我很疑虑，但是不管是好是歹，能有变动，能调离当前的苦海，多少把我从沉闷不安中暂时解脱出来。过了约摸一小时，果然来叫我了，命我拿着自己的东西走出刚打开的监房铁门。我所有的东西虽不多，除铺盖中一条薄棉被、一

条毯子外，只有一只大搪瓷杯和牙膏牙刷毛巾之类，总共不过二十来斤，可是由于身体虚弱，拿起来也觉费劲。这些东西都是在我被捕后，看守所派人到我宿舍中取来的，我的其它东西和一些钱不知下落了。我所最关心的是两张大学毕业证书，一张是中文的，一张是英文的，是不久前从家中整理出来的，准备在国外证明学历之用，也不知去向。

在催促声中，我被戴上手铐，登上一辆黑色警车，车上除司机和一名押送我的公安人员外只有我一个人。与一般一车押送许多人的情况截然不同，原因何在我至今不明。车门一关上，车厢中一片漆黑，随后听到发动机开始转动，车子慢慢地开动，开往哪儿不得而知。我心中纳闷，为什么这次一辆车专为押送我一个人，想来情况不妙。

车子走了相当久，忽然一个急转弯便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了，只见是一片广场，约有一个足球场大，空荡荡不见人影。此时天色已晚，看不清四周情景。公安人员命我下车，押我走到广场尽头。迎面一座砖木结构的老式楼房，有三四层高。大门内外有好几个公安武装人员把守。进了大门是一道走廊，直通一长方形大厅，大厅很大很高，二楼和三楼监房外的走廊即围绕大厅上空。在大厅底层仰视，即可通过走廊的栏杆看到各监房的门。整座楼内的门柱子和地板都漆成鲜红色，与白色的墙壁成强烈的对照。大厅四周、楼梯处、走廊四周，到处是武装人员，手持长枪或短枪，如临大敌，充满恐怖气氛。我被押到楼梯旁的房间中，室内已有几十名犯人成列坐在地上，低头不语，因此人虽多却鸦雀无声，一片死寂。室内一名干部口气严厉，面带怒容，命我坐在后排末尾，低下头，不许东张西望。

随后，进来了几名干部，带着文件夹，先是点名，然后厉声说：“你们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华东地区关押反革命犯的最高机关车站路看守所。你们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是人民的敌人。你们要知道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是无比强大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为非作歹逃不出人民的法网。现在被逮捕了，就必须在此老老实实在地交代问题，努力自救，争取宽大处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是政府一贯的政策。你们如果执迷不悟，坚决与人民为敌，死路一条。”

这类话我已听过多少遍了，所以思想上也没有特殊的反应。训话完毕，我们二十来人

便被押到楼上，顺序关入监房，每间关进一人。我被关在二楼的一间监房中，面积约二十平方米，白色墙，红色地板，红色门。门对面墙的顶端有一小窗，离地有三公尺，从中可见天空和透入光线。房间左边的墙上，顶端有一小空隙，其中有一盏电灯，原来是和隔壁的房间合用一盏灯。室内已有二十来人，每人平均所占面积约一平方公尺，情况比公安局看守所稍好一些，夜里睡觉还能伸直腿。墙角有一木制大便桶，早晨起身和晚上临睡前，大小便也要排队等候，这是生活中最烦人的事，只有默默忍受。

这看守所既被告知是关押反革命分子的最高机关，它的严厉和可怕可想而知。共产党是不用政治犯这一名称的，唯恐政治犯这名称会提高反革命犯的身份。后来我在不断的调动的接触了无数的犯人，得到了很多信息，才知道关押到这里来的犯人，绝大多数被判死刑或无期，判有期徒刑只占少数。有极个别因错捕而释放，称为“教育释放”，表示是由于罪行轻微而不是错捕。因此深知内情的人们有这样的说法：一旦被关到这个看守所，一半性命没有了。

这看守所的纪律极严，没有人敢违犯，否则就会因抗拒而自趋绝路。这里的主要任务是搞清犯人的罪行，调查和逼供双管齐下。一方面派人各处找罪证，一方面用鼓励、恐吓、欺骗、精神折磨以至体刑来逼使犯人招供和检举，提审日夜不息。有时夜半提审，乘人不备，不易伪供。有的人加上镣铐，关入重刑犯牢房，内中情况不得而知，因为这类犯人后来几乎都被处死，不可能把情况传出来。

监规详尽，条目繁多，我现在所能记得的有：不准低声交谈，交头接耳；不准互谈各自的案情；不准互报外界的事，尤其是国际形势和朝鲜战争。有文化的人除坦白交代本人的经历和犯罪事实外，还要代替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的犯人代写坦白材料，我便是被定为干这差使者之一。这是一种很不容易干的工作，凡是反革命特务犯人的情况大多很复杂，过程很周折，牵涉面很广，再加有一些闽、粤、徽、滇等省人，普通话不会说或说不好，替他们代写坦白材料更为困难。我在这看守所中除搞自己的问题外，这项工作做了不少。监房中光线不足，每天在黯淡灯光下写材料，日子一多以至两眼发炎红肿，早晨起身后，



两眼被眼屎糊住，睁不开眼。我不得不勉为其难，以对处理本人问题时有利。

看守所里，犯人要轮流值日，值日的事除抬马桶外都不是重活，但因人数多时间紧，也非常紧张。倒马桶的任务确是一种苦差事。那马桶很大很高，坐在上面两脚悬空不能着地。为了要容纳几十人一整天一整夜的大小便不得不这样大。每天清早都是满满一桶，抬起来非常重而且脚步要很稳，否则粪水要泼出，体力差些的人是很难胜任的。如果把马桶倒翻那将闯出大祸，因为所有被褥衣服碗筷和其它用品全都放在地板上。好在我被监禁的时期内，监房中未曾发生这一灾祸。

我被关入看守所监房后，只调过一次监房。每天起身到睡觉，除两餐以外全部时间都用在紧张的学习上。所谓学习就是上大课、讲政策、宣读文件、公布条例等，多数是通过扩音器传达，少数是集合后开大会传达；开斗争会，有大会斗争，小组斗争，以贯彻启发教育和互相帮助的作用；再者就是提审和写材料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促使犯人坦白交代和检举揭发，达到据以定案这一目的。

每间监房有学习小组长一人，掌握学习，保管学习文件和坦白交待检举揭发材料。这小组长到底是什么身份，谁也不清楚。据他自己说也是犯人，可是他绝不谈本人的事，使人怀疑他是个暗派的干部，但谁也不敢问。他有极大的权威，领导小组的干部似乎很信任他，因此大家都怕他。他发号施令，颐指气使，甚至处罚人，没有人敢违抗。

我从公安局看守所调到此地，细节上虽有不同，但总的来讲不外乎逼供和诱供，而后者更富于恐怖气氛。在此经常听到脚镣银铛和押送犯人的警车呼啸声，据说那是押送犯人到江湾刑场执行枪决的。

有一天晚上我的监房中新关进来一个犯人，学习时分派他坐在我旁边。这人很年轻，二十多岁，身强力壮。相处几天后彼此稍熟，我暗下低声问他是干什么的？什么事被捕？他起初不答，继而用右手食指弯了两下。我不懂他的意思，又不便追问，因为这是犯监规的，如被别人听到了检举，是要招祸的。我俩的低声问答是趁开饭前后、初起床后、临睡前，室内乱哄哄的时候。后来在开饭时，分饭分开水大家在忙乱中他才极小声地告诉我，

他是公安队员，驻扎在江湾刑场，任务是枪决死刑犯。我听了一惊，原来他是刽子手，我这才明白他先前用右手食指弯几下是表示开枪的动作。至于他为什么被捕入狱，话太长不便细问。我只问了被他枪决的人多不多，他只点了一下头便不再作声。

学习小组长曾说：“你们出去有三种车可坐，一种是三轮车，那是回家；一种是黑色警车，那是押送到监狱判徒刑；再一种是红色警车，那是押送江湾刑场执行枪决。你们务必要相信政府，彻底坦白交待，检举揭发，努力自救，争取坐上三轮车，至少也要争取坐上黑色警车，虽被判刑还有生路，还有前途。千万不要弄到坐上红色警车，落得可悲可耻的下场。”

由此可见，那刽子手所说证明了小组长的话不是在吓人，而是事实。从每天上下午两次警车呼啸声，从监房中不断押进押出人数之多，再从那刽子手所透露的来看，被枪决的人决不在少数，这情况在我这样一个还在侦查审讯阶段的未决犯的精神上投下了阴影。

## 定案

我被关入看守所以后，除了去大厅听大课和被叫去谈话了解我的情况外，并没有正式提审。可是有些人却天天提审，有的人甚至在半夜里被叫去提审。目的不外是趁被提审人在瞌睡朦胧中不易编造谎言，不能自圆其说，易出破绽，从而侦破案情。这一办法据说对案情复杂而且不肯吐真情的犯人经常使用。据我猜测凡是案情严重复杂、同犯多、牵连广、对问题不易搞清的人提审就频繁。以我而言，案情既简单又无同犯，因此提审就少。但是罪行大小，判刑轻重却并非与此有必然的联系。不来叫我去受审总是使我焦急不安，尤其是天天过着那样恐怖难熬的日子。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少天，有一天终于来叫我的番号，去提审了，我既高兴又紧张和恐慌，带着这种复杂心情去过这一难关。

提审是在一间很小的房间中进行的，除提审员和我本人外别无他人。提审员提出的问

题与公安局看守所中的提出的问题，内容几乎全部相同，不过是老戏重演一遍。最后提审员却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使我很吃惊，他问我是否阴谋拉拢落后分子组织反动组织？这下可把我弄懵了，有如一个晴天霹雳，猝不及防，一时竟不知说什么。

我在气愤之下激动地反问：“说我企图搞反动组织，更是无稽之谈，我既出国怎能想要留在国内搞这项活动？再说既要搞组织必须有同伴，同伴是谁？在哪儿？我一个人是搞不成组织的。你们凭空提出这种毫无根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

车站路看守所的提审员是专对付反革命犯的，要比公安局看守所的提审员严厉得多，所以表情冷酷，好像有绝对权威，不容犯人置辩或反问，对我敢于反问感到惊奇。于是又反问我：“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根据？我们是根据对你的揭发材料来审问你的。你对什么人说过什么话，你打算怎样进行活动，都有人证物证、时间地点，你想抵赖得了么？即使你不说我们也已知道得很清楚，来问你是提示你一下，看你坦白不坦白，有没有认罪的表现。你认为你不坦白不承认便不能判你吗？现在是人民的法律，以事实为依据，没有口供也照样判你。”

在这种情况下我虽明知被诬陷，却申辩不清，且恐当时会愈辩愈糟。

提审员见我不吭声便说：“你回去好好考虑，作思想斗争，限三天内把详细情况一丝不漏地写出来。你如果不照办，后悔莫及。”

就这样又把我押回监房，这时我心理上的压力更大了。我自幼身体健壮，情绪稳定，可是经过逮捕后长时间的折磨，身体顶不住了。这次提审后回到监房，不思饮食，夜不成寐。继而头痛发烧，病倒了。三天期限已过，我的材料还未交出，心中又着急，学习小组长奉命向我催交材料，见我躺倒不能起身，只好放宽期限。我昏昏沉沉地躺了许多天，并服了一些成药，渐渐退烧，又继续休息了几天。所谓休息就是获准躺在墙角，免于正襟危坐地参加学习，免于列队去听大课，免于参加斗争会。轮到当值日，生活上的杂事如领饭领开水、分饭分开水、倒马桶、擦地板门壁等等也可轮空。

在我身体稍为恢复后，学习小组长传达上面命令，要我在两天以内交坦白材料，决不

再放宽。我为这件事思想激烈斗争。我想如果顺从他们的意见，承认我曾有过搞反动组织的企图，从而避免了所谓抗拒，避免了正面冲突，情况可能会好一些，而且只有企图而没有具体行动，不致构成严重罪行，可能得到从轻处理。

但是继而一想，对这样严重的问题我不能默认，不能自己诬陷自己，不能把自己没有干过的事承认下来，使虚构成为事实，而且与共产党对立的组织是共产党最忌讳最痛恨的事。我隐约记得学习过这方面的材料，号召加强对反动组织的苗头的警惕，要消灭它在萌芽时期。我如不把这一类的罪行坚决否认，很有性命危险。再说如承认了，那末伪造事实来诬陷我的人就会因功受奖，更为得意，并因此获得更大的信任，从而进一步搞陷害人的勾当来损人利己，这是最令人难忍和痛恨的事。

考虑到这些，我便动笔写材料，据理力争，不屈于当时形势。我所持的反驳理由很简单，就是说以前多次提审中已把我企图赴香港转去联合国的罪行确定，我本人也已承认，这件事就已定案了。现在却又说我企图搞反动组织，那末前者与后者是互相矛盾的，我分身乏术，要从事前者就不可能从事后者，反之亦然。你们对揭发材料应详加调查核实，不能偏听偏信，不能以此为依据来进行逼供。我匆匆写完这份材料，填上番号姓名，打上指印就交了，后果如何听天由命吧。交上材料后我难免忐忑不安，生恐这材料招致灾祸，可是出乎意料之外，一连多日没有来叫我。

有一天下午公安人员又来叫我了。穿堂过户，经过几道周折，把我带到一排平房前。经这次走动看到这个看守所规模宏大，楼房平房很多，事实上是一所大监狱，只称为看守所恐怕是因为关押的都是未决犯。一排排的平房前都有公安部队站岗，气氛森严。我被带到一间平房，屋前也有公安部队看守。屋内陈设简单，只有正中一张桌子，两张椅子，桌子对面离开约四公尺有一张椅子。桌子正中坐着一人看来是提审员，旁边坐着一人看来是记录员。我便坐在桌子对面的椅子上，双手被手铐铐在椅子扶手上。屋中只此三人，公安人员已退出门外。审问开始，先是照例问姓名年龄籍贯等，然后问个人经历和“罪行”。我便一一如实作答，但关于“罪行”，我只述事实，思想上不认为是罪行，并且有的我承认，

没有的我依然据理反驳，坚决不承认。这些事已经炒冷饭炒过多少次，我已讲得十分厌倦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提审员也并不多追究，对我的反驳不置辩，只是冷漠地不厌其详询问动机、经过等细节。

这样他问我答进行了约两小时多，窗外天色渐暗，估计已到晚饭时刻，提审员好像想要结束，冷场了一会儿，可又继续提了一些问题，是我料想不到的，也想不出与我的案情有什么关系。记得其中有一则问我某月某日和某人一起去逛吴淞口，有没有这回事？目的是什么？诸如此类，这种问题据我看来是毫不相干的事，问此究竟有什么用意，莫明其妙。

提审完后，把我松铐，叫我看记录并在每页上盖指印。我一看记录一大叠，约有七八页之多。前两页是姓名番号年龄籍贯出身和学历经历等，其后便是提审内容，是用一问一答形式记录的。有很多处所问没有记全，所答更没有记全，甚至在答字下面完全是空白。我随手翻了一下也未细看，便问：

“记都没有记全，这样多的空白就叫我盖指印，承认是我的口供？”

他二人面面相觑，不能作答，一声不吭。我继续把记录看了一下，凡是记下来的还没有出入。这记录员是个男青年，不足二十岁，文化程度想来也不会高，叫他担任这种繁重的记录工作，当然不能胜任。我心想在没有法纪没有人权的情况下，他们想把你怎样就可把你怎样，即使记录记全了，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反正这条命已掌握在人家手中，随它去吧，空白处随他们去填写吧。如果要求把记录记全又不知要费多少口舌和精神。当时我身体虚弱，精神已濒临崩溃，实在不愿再多周折，于是一言不发，毫不犹豫地迅速地在我的姓名下面盖上指印。

他俩看了看又说：“页与页的骑缝处也要盖指印。”

我心想记录记不全，要人盖手印却这样认真，真是可笑。我不置一词，完全照办。他俩对我的爽快盖指印又不多事责问记录不全似乎很满意。

我由于理直气壮，心不虚，便问还有什么事要问现在就问，省得再来叫我。提审员想了想后说：“目前没有了，你先回去吧！”

于是我又被带回监房，当时已到开晚饭时刻。看来这次提审可能是定案，因为以前提审没有记录员作记录，也没有叫我盖指印。果然以后没有再来叫我。

## 红色警车

天气渐暖，监房内人多，又没有洗澡，人人散发出汗气，愈来愈臭，空气污浊不堪。监房中无日历，又无报纸，也不知过了多少日子。一天午饭后，公安人员突然来叫我的番号和姓名，通知收拾东西要调走。

我一向比较镇静，不会慌张，但此刻也紧张起来。因为同室犯人中有一句口头禅，“调出监牢，性命难保。”我虽不尽信，但这句话对我的思想多少发生了影响，此刻心中慌乱，不知所措。同室的犯人见我发呆，催促我：“你还不赶快收拾行李，不一会儿就要押你走了。”

他们由于同病相怜，富于互助精神，七手八脚地帮助我打铺盖，捆东西，并在我的铺盖中塞了很多肥皂和手纸。

刚收拾完毕，公安人员便开门来叫我出去。我艰难地背起铺盖，提起捆好的脸盆杂物，走出监房。临出门时我回头向同室的犯人说了一声：“再见。”

他们也对我说了一声：“再见。”其实这“再见”意味着今生彼此永远不会“再见”了。

我被押出监房后，被押到楼下一间大厅。厅中已有一百多犯人排成纵队坐在地上，全都低头弯腰，不敢交谈，更不敢东张西望。我因后到，坐在最后，不易引起注意，略抬头可以看见二楼走廊上武装人员持枪环立，注视着楼下大厅中的犯人。大厅前端有一张长案，上面堆放着一包包的东西，大小不等。有好多干部在叫名发放这些东西。我因坐得远，看不清是什么东西。等到叫我名字前去领东西，打开小包一看，才知道是我在公安局看守所被捕时收去的手表和一些钱。那时是几十万元，折合币制改革后的几十元。发还我这些东西使我心中一宽，以为可能要放我出去，但按形势来看，又不像有这样的好事。

果然，听到发给另一犯人东西时，有一干部拿了一个打火机，问另一干部：“这东西能

不能发还给他？”另一干部说：“不能发还给他，我们另立清单，一起直接移交给他们。”

从这段交谈中可以听出被放出去是不可能的，否则打火机为什么不能发还？又说是另立清单一起移交给他们，可见是把犯人转押到另一地方。我的幻想一下子被扑灭。

东西发完后，为首的干部命令大家起立，两人一对地连铐起来。这样一来，犯人拿起各自的行李更为困难。大家排成四人纵队，蹒跚地走出大楼大门。广场上布满了武装部队，还停着许多红色大警车、吉普车、摩托车。犯人们便从武装部队手持冲锋枪的枪口前穿过，登上红色大警车。我心中一惊，监房的学习组长曾说过：千万不要弄到坐上红色警车，那是押犯人去刑场的。难道我真的就被送去刑场吗？我的问题还未弄清楚，就这样被处决吗？

自被捕以来，可能被处决的思想时时在脑海中盘旋，时间一久有些麻痹了。可是我自忖一生从未干过坏事，从不损人利己，从未犯过法，一向以法纪和道德约束自己，而且从未参加过政治党派，从未从事政治活动，想不到而今竟会以政治上的罪名死于非命。这对家人，尤其是年迈的父母将是多么大的打击，这确使我悲恸之极。如果思想上没有牵挂，没有因冤屈而愤慨，一死本不足道。

登上红色警车后，车厢后门即被扣上，车厢中顿时一片漆黑。等了一会儿，眼睛对黑暗渐渐适应，略能看见东西和人形。车厢后门上端有几道透气细缝，稍有一些微弱的光线透入。我正好坐后面最末一个，便把发还的手表从口袋中掏出，戴在手腕上。表已久停，我等车子开动后，立即拧上发条，手表开始走起来，我把指针拨到一个正点，目的是为了想知道车子走多少时间到达目的地。如果车子走了超过半小时，那就是到刑场。因为市内各地间的距离，一般都是在汽车行走半小时之内，只是江湾刑场离得很远。

车子走了二十分钟，感觉到车子走上坡又走下坡，那肯定是过一座桥。因为全市车子走不到有上下坡的地点，而且这座桥正是开往刑场的必经之路。从此地开始，再走半小时便可抵达刑场。可是出乎意料，车子过了桥才走了五分钟便停了下来，这不是刑场，刑场没有那样近。随后听到沉重的铁门开动声，这不是刑场，刑场是没有大铁门的。

车厢中见多识广的犯人在轻声说：“提篮桥监狱到了。” ■

【述 往】

## 追忆三线“五·七”厂（三）

马昌海

### 中国有个“大家拿”

随着成为工人阶级的热情慢慢消退，生活更日渐平淡枯燥。几年以后，随着价值观念的逐渐变化，人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在交互作用的影响下，不论什么工种的工人，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行为：“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最初只是顺点工具，榔头、钢丝钳、螺丝刀之类，以后就慢慢发展成什么方便就偷什么了。我在厂里管冷饮，面对储存了几千公斤白糖的小库，在当工人的后两年也拿过白糖。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给好友家祥一瓶白糖，结果他当电工的弟弟家豪见到我就大念唐诗：“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我也无言可对。可见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念是何等顽固。我开冷冻机值夜班时饿了，也有过拿做冷饮剩下的酸梅汁冲着喝。相对而言，我还算是小偷小摸。第二食堂专管各大车间运转班中间的三顿饭，食堂管理员每天提着一个暖水瓶来上夜班，趁人不备悄悄灌满食油，早晨下班再提回家。有一天一个炊事员想喝水，拿起这个暖瓶，倒出来的居然是菜油，这才败露。你想想他偷了多少食油？有一次食堂炸肉丸子，我看见那个心黑手狠的孝感籍炊事员，捧着冒尖的一大碗肉丸子，蹲在二食堂的门口吃，谁也不敢管这个一身黑肉的蛮横壮汉。

有一天大食堂杀了两头猪，下锅做成熟肉，因滚烫没有出锅。到下午上班时，两头猪肉都不翼而飞。报案后县公安局发现，街上有人在卖熟肉。在整理车间，有人偷了整匹的坯布，夜半扔到厂围墙外，等吃夜班饭时抽空绕过围墙去取时，居然空空荡荡！难道是被半夜游荡的路人捡走了？针织工场的成衣车间，也常发生盗窃事件。

“所有制”一词，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原著中的德文 Eigentum 或英文 Property 的误译。



前苏联的译者用所谓“所有制”的概念代替了马克思原著中的“财产（权）”理论。我们的所谓“全民所有制”，与马克思所讲的民主制度下的、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社会所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及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并不是一回事。“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国有制”，其实都是带有虚幻感的概念，20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工人，有几个人把自己当成是企业的主人？现如今呢？

出于产权关系不明晰而造成的“人人都是主人，人人都不负责任”的状况，理论界所讨论的国有经济“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从苏联开始，社会主义“公有制”一直采取政府所有的形式。这一形式如果在政治上、经济上未能做出严格地限制并正确地加以规范，往往就可能蜕化为特权阶层所有制，从而阻滞向“社会所有制”的过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真正能够使国有企业摆脱政府“附属物”的状态，使广大的普通工人真正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才有可能摸索出一条向“社会所有制”过渡的某种形式和途径。这才是为摆脱苏联式“社会主义”旧模式而可行的一种演变途径。

### 并没有感到丰富的业余生活

李南央所在的“陕汽”当年之所以能够有较高水平的丰富业余生活，这恐怕是有1500个北京66届初三和高三毕业生参与的结果。不知当年的中国，还有多少企业常年同时集中了数千朝夕相处的66届初三、高三毕业生？“老三届”学生中本来就人才济济，北京又是藏龙卧虎之地。1500个北京66届初高中毕业生，特别是还有不少老高三毕业生，如果不闹出点动静来，那还对得起养育了他们的那片热土吗。学者朱学勤就有过亲身感受：文革前重点中学的老高三生，综合素质高于后来的研究生。他在复旦读博时，还以此为据指摘过一个研究生班长：你的见识，还不如一个文革前重点中学的老高三生！

据我的亲身体会：文革前，全国各地重点中学学生的综合素质应该是不相上下的。在“五·七”厂表现比较突出的老高中生，人数似乎也不是很多。“五·七”棉纺厂的原北京学

生大概有 300 人，以 69 届、70 届的居多，“老三届”的不到半数，其中老高中生大概只有 30 来人。就这样，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和黄石市人民广播电台还一下子就挑走了 4 个播音员。当然，我们的业余生活比上山下乡时还是丰富多了。

我们这些“老三届”的 100 多个下乡知青，从东北、内蒙古、陕西、山西、新疆、云南汇集到安陆，大家聚在一起，首先就会聊起下乡的经历和事情，天南海北的风土人情无所不谈。那毕竟是我们走向社会的人生第一课，印象太深，对我们的影响也太大了。这样的话题，竟然延续了两三年。除了这个话题，就是聊文革前看过的小说和电影，详详细细地描述，如临其境，堪称是一种精神会餐。不仅增长了见识，还练就了会讲故事的口才。

到了炎炎夏日，也有人常去府河游泳，在河滩上踢球。直到筋疲力尽之后才回厂。有一次几个人踢完球回来找我要冷饮喝，一人半塑料勺喝下去，几分钟以后，其中一个伸出胳膊让我看：已经渗出了点点汗珠。

由于在锡林郭勒草原下乡插队数年，只要安陆县电影院放映没有看过的影片，我就会跑去看。一次由于买电影票挤撞与县城当地的小流氓发生了冲突，县公安局的警察不由分说，就把我们带走讯问。释放以后，我们才赶去看了已经上映了一半的电影。此前厂里的一帮北京学生，在县电影院也是因买票与当地的恶少发生冲突，结果被县公安局拘留了三天。这些人不服，就在牢房里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释放时，拘留原因居然写的是“骄傲自大”，要他们签字。

厂里每周如果能放一场电影，就是一大乐事。影片中的插曲也很快就会在全厂流传开来。尤其是外国电影，如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南江村的妇女》、《一个护士的故事》；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中的插曲。南斯拉夫电影《桥》1974 年上映后，其插曲《啊，朋友再见》迅速流传，成为联欢会上受欢迎的男声小合唱。1976 年上映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初春》中，有一群德国兵在街边酒馆醉醺醺地高唱意大利民歌《美丽的村庄》。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氛围下，熟悉这首歌曲的北京学生很快就浑水摸鱼，在厂里的文艺会演中推出了。如果是在文革的高潮时期，恐怕没有人敢公开传播

法西斯德国兵唱过的歌曲，不管他们唱的是什么歌。

吉他在文革时被视为不务正业的玩物。因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屈》中的一句对白：“没想到革命者也玩吉他”，以及弹着吉他唱起的歌“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吉他热，其弹奏还有西班牙吉他与夏威夷吉他之别。此后就时常看到三三两两的青年在弹着吉他吟唱。

当然，在“五·七”厂的青工中，特别是在北京学生中，私下里演奏的外国乐曲和哼唱的外国歌曲就太多太多了。不少人学拉手风琴和小提琴，弹吉他，还有冬育、米甘等几个吹黑管的。厂工会组织过几次各车间的文艺汇演，排演过《红灯记》，《黄河大合唱》、《长征组歌》等。与南央所在的“陕汽”不同的是，没见过由“五·七”厂职工自编自导的文艺节目，大概是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吧。车间一级的工会有过什么作为，也没有什么印象了。

厂工会经常组织篮球、排球、羽毛球联赛，还组队外出参加各种比赛。舍弟在这方面表现比较突出，当年在“五·七”厂，大家都知道活跃在各类球场的锅炉房的“马胖子”。厂工会还举办过两次全厂运动会，大家都兴奋了好几天，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气氛。舍弟又成为百米径赛和田赛跳远的冠军。

但我和舍弟都无缘参加七二无后坐力炮实弹射击训练，是拉到山里打的。

“五·七”厂毕竟与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因此也看过一些内部发行的书籍：最早的一本《第三帝国的兴亡》被裁成了四册，大家争相传阅。我是第一次从这本书里知道，斯大林与希特勒共谋瓜分了波兰。后来又读了锡兰（斯里兰卡）共产党人特加·古纳瓦达纳夫人写的《赫鲁晓夫主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斯大林女儿《给友人的十二封信》，对斯大林的了解就更多了。当时还看过一些前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你到底要什么》、《落角》、《多雪的冬天》等。看《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第一次接触到“意识流”文学手法，简直是心惊肉跳般的兴奋。读过几本战争回忆录，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什捷缅科的《战争时期的苏军总参谋部》等等，深有感触：苏德双方都动辄动员上百万兵力的大会战，一次战役就死伤几十万，一次就被俘几十万。相比之下，

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也太“小儿科”了。那时我还不知道国军在抗战期间进行过 22 次大型会战，蒋介石在武汉会战时动用了 110 万国军。诺曼底登陆，盟军居然出动了 280 万人。

另一个感受是：普通士兵的生命在这样的战争中太微不足道了。只是为了与盟军争夺攻克柏林的功绩和荣誉，就在已近胜利的前夕，在欧战的最后一仗中牺牲了 30 万苏军将士。

还看过一本 4 个日本“左翼”青年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真心相信苏联已经“变修”了。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中国邀请这 4 个人以“日本青年反修代表团”的名义访华，还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心中激动不已。

那时“五·七”厂也流传过几本文革前出版的旧书：如《牛虻》、《斯巴达克斯》、《安娜·卡列宁娜》、《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红与黑》、《九三年》、《基督山恩仇记》、《我所知道的戴笠》等等。只可惜这样的书籍太少了，那是个“一书难求”的时代。

学徒工出师以后，每年都可以享受 12 天的探亲假。很多人都将平时加班的时日集中攒在一起，利用“调休假”延长探亲的时间。每当有人从北京探亲回来，我们就会像过节一般围坐在其身旁，桌上摆着从北京带回来的糖果香烟，大家挤成一堆，听他讲述在北京的一切所见所闻，如醉如痴，如同会餐一般的兴奋和满足。有时谈及中央内部的小道消息，大家就赶快紧闭门窗，小小的房间里不久就已是烟雾腾腾。

如果有人在北京看过内部电影：如《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巴顿将军》、《他们比男人更凶狠》；港台武打片《黄天霸》、《恶虎村》等等，那就更过瘾了，绘声绘色娓娓道来，能说好几晚上，让人回味不已。在那年代，只有部分人有机会回北京探亲，对能回北京的人，当然是羡慕之极。北京当时是我们心目中全世界最最美好的地方。

大约是 1975 年，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和各省一样，开办了英语教学节目。“五·七”厂也兴起了一股小小的“英语热”，学习者以北京学生居多。还有些人，包括大学生，一直坚持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九百句”教学节目，但前提是要有原版教材和一台较高质量的短波半导体收音机。有人冒险按“美国之音”电台广播提供的地址写信，免费索取“英语九百句”教材，居然也顺利收到了。

毛主席1975年发出“七·二一”指示后，厂里也开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由北京来的工程师和“老五届”大学生授课。同时还开办了业余大学，上百人热热闹闹去上课，盛况空前。业大从初中的数学开始讲起，陆陆续续开设过不少课程：机械制图、金属工艺学、电工原理、晶体管电路、理论力学、材料力学，还有棉纺织工艺学；各车间的工程师按照生产流程讲厂里各种机器设备的原理。这些课程我基本上都是听了一半就学不下去了，一是提不起兴趣，二是实在学不进去。机械制图到现在还记得“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大概只能画轴类和轮盘类的图纸；金属工艺学只记得一点铸造知识；电工原理仅仅记得节点电流定律（基尔霍夫定律）和回路电压定律；晶体管电路还记得整流与放大；理论力学只记得一个到现在也没有搞明白的“转动惯量”。不过，棉花是怎么成为棉布的，棉纺织设备的基本原理，大致还是清楚的。

### 改革开放的开端——忆高考

从1972年开始到1976年，“五·七”棉纺厂先后选送推荐过几批“工农兵大学生”入学，但其中具备升学深造潜质的不是很多。

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以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发文决定恢复高考制度为开端的。这是邓小平在全国农村改革启动之前就已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是对十年文革最直接有力的第一次否定。据教育部考试中心提供的数据，当时全国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竟然有一亿四千万人。高考为1966—1979届初高中生提供了文革以来第一次平等竞争的机会。以此为标志，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那时的我们已近而立之年。“人生能有几回搏？”1959年新中国第一位世界男子单打冠军容国团的名言激励着我们，竭尽全力地投入了高考。这是抓住青春尾巴的最后一次机会，因而显得十分难得而紧迫。

1978年元旦一过，同在“五·七”棉纺厂做工的我们，见面时常常言不由衷地提及高

考，因为厂里有100多人参加了1977年底由各省单独命题组织的第一次高考。几位文革前重点中学的老高中生，谈起高考都摇头叹息：考题太容易了，以而立之年去与十六七岁的应届生相比（那时有些省市的小学、中学都是五年制），如此简单的考题，使前者在考分上难以占到优势，而在年龄上又处于明显的劣势。他们以文革多年来所形成的思维习惯自我安慰：国家容许30岁的老高中生们参加高考，只不过是拿我们这些人作陪衬罢了，因而连呼上当，有种被愚弄的感觉，说下次再不会受骗了。他们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仍暗含着希望，又害怕因过高的期望值而伤害了自己。但他们没有想到：1977年各省按照初中文化标准命题的高考试卷，竟然有98%的理工类考生不及格！春节一过，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到达，厂宣传科成为众目所瞩之地，每天都从那里传出喜讯，人们奔走相告，消息顷刻间传遍全厂。在这种氛围中，尚未接到录取通知书的人都在暗想：下一个会轮到我吗？那些发过牢骚的老高中生都打点行装上路了，尽管被录取的院校和专业并不尽如人意，但他们对这来之不易的机遇还是非常高兴的。但有几个呼声很高的人却杳无音讯，原因不明，因为当时还有政治审查这一关。我后来才得知：1977年底的高考，武汉大学的子弟，只要通过了四门160分的湖北省最低录取线，就可以入学。而考了300多分的原北京27中老高三的沪生和考了280多分的原清华附中老高一的米甘却都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听说沪生去孝感地区教育部门查询，居然连高考档案都找不到了。可见第一次由各省单独命题的高考，组织工作还不够严密。在全厂通过了分数线的30多位考生而最终未被录取的4个人中，不幸也有本人，虽感沮丧，也只能认命。众多同道金榜题名，极大地鼓舞了当初持观望态度而未参加高考的人们：种种疑虑基本消除，更多的人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准备一搏。我经过了一番调整，也逐渐从失落的心绪中走了出来，重整旗鼓准备再战。在湖北难耐的酷暑中，我们常常蹲在椅子上看书，因为裤衩总被汗水浸湿，椅面上常常是湿淋淋的一片，胳膊与桌面之间也常常要垫块湿毛巾。当时我在厂财务科做出纳，每个月都给那些工龄满五年而进了大学的人寄发当月工资。在汇款单上填写那些熟悉的名字时我曾想：哪一天有谁也会给我往高校寄工资呢？第二次全厂又有200多人参加全国统一的高考，是1978年的

7月。这一次又有50多人被录取。沪生进了北大数学系，米甘也进了华中理工大学制冷及深冷技术专业。我第二次高考的成绩仍然不如人意，最终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懵懵懂懂去安陆县城派出所迁户口的时候，我想起10年前从北京将户口迁往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情景，终于意识到人生命运的再一次转折。在火车上看到三三两两、兴高采烈的大学新生们时，有一种如同梦幻般的感觉。因为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在文革中是不可能上大学的。1977年底有570万人，1978年7月有618万人参加了高考（在世界考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中1977年录取了27.2万人，1978年录取了40.2万人，两届的入学率合起来仅为5.67%。1979年又招收了20.6万人入学，1980年后才全面恢复了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的高考制度。恢复高考培养和准备了一支坚决拥护改革开放并身体力行的骨干队伍，我们有幸最先站到了中华民族再次奋起腾飞的起跑点，最早嗅到了公平、透明的新鲜空气。而更多的同龄人，就只能在今后的岁月里通过成人教育来完成自己的学业。

在紧张的备考之余，我几次听过一首据说是为粉碎“四人帮”而创作的管弦乐曲《北京喜讯到边寨》。以后每次听到这首乐曲，就使我想起了难忘的高考。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靠自己的能力去努力改变和把握人生命运的一搏。

而后，我们陆陆续续走出安陆“五·七”棉纺厂，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资料】

##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全体革命造反派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7.01.26)

新华社太原二十五日电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全体革命造反派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全文如下：

最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们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全体革命造反派，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致以最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当我们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我们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告和看到人民日报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万分激动，这是您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鞭策。是在您老人家的伟大思想指引下，我们山西革命造反派，从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组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手中把大权夺过来了！我们纵然高呼一千遍一万遍“毛主席万岁”，也呼不尽我们对您无限热爱的心情；我们纵然高唱一千遍一万遍《东方红》，也唱不完我们永远跟着您闹革命的决心。

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组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秉承他们黑司令的意旨，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长期以来，把山西搞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们打击、迫害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残酷地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紧跟他们的黑司令，更加变本加厉，顽固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围剿革命造反派，最近，又抛出经济主义这个破烂武器，对抗您老人家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企图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在您老人家光辉思想指引下，在您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实行了大联合，团结广大革命群众，给他们迎头痛击，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围剿，击败了他们经济主义的腐蚀，坚决执行您的革命路线，坚决贯彻您的“抓革命，促生产”的英明指示，打退了他们的反扑，出现了新的革命大好形势。

我们工人、农民、学生、干部的革命造反派高举起您的旗帜，和领导干部中的革命造反派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山西军区的全力支持下，夺了他们的权，专了他们的政，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回忆回忆这个幼苗刚出土的时候，阴风恶雨阵阵袭来，阶级敌人的黑手伸向了这株初萌的幼苗……。

阶级敌人极端害怕我们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的领导干部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就极力混淆领导干部中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攻击我们是被机会主义控制的“黑组织”。

阶级敌人极端害怕我们革命造反派和人民解放军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就拿出什么“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法宝，攻击我们成了“宗派主义”斗争和“反革命”复辟的工具。

但是我们坚信，革命的领导干部和我们共同战斗完全符合您对他们的教导：“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我们坚信，人民解放军站在我们革命造反派一边也完全符合您对他们的教导：“紧紧地 and 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当我们学习了您的指示之后，心更红了，眼更亮了，我们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行动是完全符合您的思想的，我们一定高举起联合的大旗，高举起夺权的大旗，勇敢地迎接斗争的暴风雨，您那金光闪闪的宝书告诉我们：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毛主席呀，毛主席，是您老人家引导我们拨开了迷雾，看准了方向，站稳了脚跟。每当想起了这一切，叫我们怎么能不一次又一次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怎么能不一遍又一

遍地高唱《东方红》！

我们深深地懂得，您老人家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斗争，我们正做着前人从未做过的事业，我们面对着的敌人不仅是山西省这一小撮坏蛋，而是整个的旧世界，我们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有您老人家在前面引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能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扫尽一切害人虫！用我们的铁拳，打出一个红彤彤的共产主义的新山西！新中国！新世界！

最后，我们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全体革命造反派最最衷心地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全体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资料】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7.02.02)

新华社哈尔滨一日电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在三十一日举行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上，通过了给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致敬电全文如下：

我们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今天是我们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驻军部队指战员和革命群众最盛大的节日。我们怀着无限激动的心情，最最热烈地祝福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您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您的忠实的红小兵。您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在您的指引下，奋起战斗，向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展开了最坚决的夺权斗争。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夺权斗争，就不能当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主席的好战士。今天我们成立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从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手里，把黑龙江省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手中来！

黑龙江省是祖国反帝反修的东北方前哨，是工农业生产的重要基地。我们斗倒了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罢了他们的官，夺了他们的权，一个崭新的红彤彤的黑龙江省诞生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焰无际，威震四方，沉重地打击了苏联修正主义和美日反动派，粉碎了他们妄图从黑龙江省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阴谋，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威风！让苏修和美日反动派以及国内那些丧心病狂的反动派在我们英雄人民的伟大胜利面前哭泣吧，发抖吧！

我们在斗争中深深地体会到，遵照您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旗帜，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和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必将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决心高举您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炬，努力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文章，提高思想觉悟，提高斗争艺术水平，建设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造反大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资料】

##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7.02.06)

新华社哈尔滨四日电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人民日报》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和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的消息以及《第一号通告》以后，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给毛主席发了一封致敬电，决心把黑龙江省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致敬电全文如下：

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致以最最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当我们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人民日报》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和我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的消息以及《第一号通告》以后，我们心里万分激动，这是您对我们红色造反者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最大鞭策。千千万万个红色造反者涌上街头，欢呼歌唱。我们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遵循您的教导，实行了全省红色造反派的大联合，在人民解放军的坚决支持下，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踞的我省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

都夺回来了！这是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虽然夺了权，但这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斗争远远没有结束。阶级敌人绝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必然要进行垂死挣扎，采用各种方式，从外部、内部进行疯狂的反夺权。因此，巩固政权就成了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我们一定百倍地提高警惕，团结我省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革命干部，依靠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对阶级敌人的各种反扑，一定毫不留情地予以坚决回击！我们一定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您所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坚决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誓夺革命生产双胜利！同时，我们也要大造革命队伍内部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反，坚决打倒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裂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影响，防止和平演变。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一切，统帅一切，把红色造反大军办成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向您宣誓：我们永远紧跟着您，革命到底，造反到底。我们一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黑龙江省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扫除一切害人虫，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黑龙江省建成红彤彤的反帝反修的钢铁前哨！用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打出一个全新的黑龙江省、全新的中国、全新的世界！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 ■

##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mailto:dw66778899@163.com)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